




中國語文

41

1955.11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於 1955 年 10 月 15 日到 23 日在北京联合召開了全國文字改革会議。这裏是会議上一些活動情况的照片。

（新華社記者孟慶彪攝）



❶ 全國文字改革会議主席团主席吳玉章致開幕式



❷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委員胡乔木作總結性發言



❸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部長張奚若主持閉幕式



中國語文 1955年11月号(总第41期)目录

为促進汉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实現汉語規範化而努力

——《人民日報》社論——

語言文字是人們交流思想的工具，同時也是社会鬥爭和社会發展的工具。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实現了歷史上所沒有过的高度的統一，並且正在掀起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熱潮，因此在佔人口百分之 90 以上的漢民族中間，大力推廣普通話，促進文字改革和語言規範化，已經成为我國当前的迫切任务。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召開了“全國文字改革会議”，从 10 月 15 日起举行了九天的会議，从 10 月 25 日起，中國科学院又召開了“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学術会議”。这兩次会議标誌着中國文字改革和漢語規範化工作的開端。

漢語是世界上最發達最重要的語言之一，漢語的書寫符号漢字，是歷史最長久、影响最深廣的文字之一。誰都承認，漢字在我國人民的悠久的文化歷史中有过偉大的貢献。幾千年來，我國古代丰富的文献典籍，依靠漢字保存下來。今後，在我國進行社会主义建設和改造的時期中，漢字仍然將被廣大的人民羣众更廣泛地使用。就在長远的將來，漢字也將繼續存在並为許多人所研究。但是不能否認，漢字有嚴重缺點，因此給学習和使用帶來了很大的困难。由於漢字的难認、难寫、难記，使我國普通教育要在文字的教学方面耗費更多得多的時間。漢字在兒童教育、成人教育和扫除文盲工作中是一項沉重的負担。要是保持漢字的現狀不加改革，就会嚴重地妨碍人民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对於國家工業化和國民經济的發展也是十分不利的。

我們的党是向來重視文字改革工作的。毛澤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論》裏早就指出：“文字必須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众”。文字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也已經是明確的。毛澤东同志在 1951 年指示：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在实現拼音化以前，首先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時進行拼音化的各項研究工作和準备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語言工作者和文字改革工作者，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首先拟定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於今年一月間發布，在全國各地展開羣众討論。同時，由新聞出版界共同选擇了最通行的簡化字 141 个，分成兩批，在各主要報紙、雜誌和圖書上先行試用。討論和試用的結果，証明簡化漢字是为廣大人民羣众追切需要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搜集和整理了羣众所提出的意見，就原草案加以修正，提出《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異体字整理表草案》。全國文字改革会議經过認眞討論並提出修正意見之後，通过了以上兩个草案，向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建議提請國务院審定公布实行。会議也同意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所提出的“約定俗成、穩步前進”的方針，和分次分批逐步簡化的办法。在这一个簡化方案公布之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还要繼續搜集羣众意見，繼續進行漢字的簡化和整理工作。

漢字簡化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使漢字的筆劃簡化，字數減少，逐步做到漢字有定形、有

定數，以便利於漢字的学習和使用。但是漢字簡化，还不是文字的根本改革。要更進一步進行文字的拼音化，那就需要做一系列的調查、研究和其他各項準备工作。在目前最迫切的一項工作，就是推廣漢民族共同語，同時力求漢語的進一步規範化。

漢民族的口头語言，在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方面漢語的方言紛歧，地區的差别性很大，另一方面漢民族已經逐漸形成一种民族共同語。这种漢民族共同語，就是以北方話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为标準音的普通話。必須使这种普通話推廣到全國各地，普遍使用，並使普通話在語音、語法、詞彙各方面，有明確的規範，中國文字才能順利地走上拼音化的道路。反过來說，如果沒有規範明確的民族共同語，拼音文字就缺乏一个確定的基礎；如果不積極推廣民族共同語，拼音文字的推行就会遭遇很大的困难。

推廣普通話和漢語規範化的工作是同文字改革的工作不可分离的。但是推廣普通話和实現漢語的規範化决不只是为着文字改革。無論为了加强漢民族的政治、經济、文化的統一，为了順利地進行社会主义的建設，为了充分地發揮語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交际作用，以至为了有效地發展民族間和國际間的联系、团結工作，都必須使漢民族共同語的規範明確，並且推廣到全民族的範圍。这是完全符合全民族的当前的迫切需要，也完全符合漢語歷史發展的实际情况的。

漢語發展的过程是非常曲折複雜的。我們曾經長期用"文言"作为統一的書面語，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这种書面語原來必然是建立在口語基礎上的，但是後來同口語的距离越來越远，学習起來非常困难，能够使用的人只佔全民中的極少數，因此另外一种和口語直接相联系的書面語不得不起來同"文言"分庭抗礼。这就是後來所說的"白話"，也就是我們現在的民族共同語書面形式的主要源头。宋、元以來，用"白話"寫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層出不窮，產生了許許多多的文学巨著。这些作品的語言虽然都或多或少地帶有地方色彩，但是總起來說，它們的方言基礎大多數是長時期在漢語中佔优势地位的北方話。这些作品也流傳到非北方話的區域裏去，非北方話區域的作者也有用这种"白話"來創作的，这就为北方話的推廣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至於口語方面，大約同这些"白話"文学作品的廣泛流傳同時，以北京話为代表的北方話也逐漸取得方言區之間的交际工具的地位，被称为"官話"，但是它的發展速度是落在白話文学的後面的。到本世紀初，隨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動的高漲，我們的民族共同語的長期形成过程開始加快，社会改革家提出了"言文一致"的主張。"五四"运動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動搖了文言的統治地位。"國語运動"和"注音字母"曾經以政令來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提倡在推行北方話方面也起过一定作用。这接二連三的运動反映了漢民族共同語以書面語和口語的統一形式在加速形成的事实，"普通話"这名称逐漸代替了"官話"，也正是由这种事实决定的。

解放以來，政治經济的迅速發展，推動着漢語的变化，也提高了語言的社会交际效能。口語方面，能說普通話的人日見其多，普通話在語音方面要求接近北京語音的願望也越來越强。書面語已經基本上統一於"白話"，達到了原則上的"言文一致"。而且会寫会讀的人越來越多，書面語在口語的基礎上隨時在提高自己的精密丰富的程度，同時也就对口語的發展起着集中和提高的作用。

我們的党是向來重視語言的純潔性的。毛澤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屢次明白指示我們要怎样学好語言，他的著作本身就是使用語言的典範。解放以來，党和政府为語言的健康發展進行了不少工作。近幾年來我們的語言学家和語文教師熱烈地参加了对現代漢語的研究和討論；國家机關和部隊曾經普遍開展語法学習；廣播工作者和戲劇工作者開始注意正音訓練；新聞界和出版界也加强了文字編輯工作。这些实际行動都在不同程度上和在不同方面体現了党和

政府的語言政策。也正是在这种有利的政治条件下，我們提出了漢語進一步規範化的任务。

全國文字改革会議已經通过了大力推廣普通話，即漢民族共同語的重要决議。“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学術会議”还要从学術方面來探討漢語的進一步規範化。为了完成这一重要任务，我們要進行許多工作。

首先要大力宣傳推行普通話的重要性。要讓人們正確地了解普通話和方言的關係。普通話是为全民服务的，方言是为一个地區的人民服务的。推行普通話並不意味着人为地消滅方言，只是逐步地縮小方言的使用範圍，而这是符合社会進步的客观法則的。方言可以而且必然会同普通話在相当長的時期內並存，但是必須不断地擴大普通話的应用範圍，要尽力提倡在公共場合說普通話，尽力提倡在書面語言中使用普通話，要糾正那种不承認普通話、不願听普通話、甚至不許子弟說普通話的狹隘地方观念，糾正那种在出版物中特別是文学作品中濫用方言的現象。

要促使每一个說話和寫文章的人，特別是在語言使用上有示範作用的人，注意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語言的規範必須寄托在有形的东西上。这首先是一切作品，特别重要的是文学作品，因为語言的規範主要是通过作品傳播開來的。作家們和翻譯工作者們重視或不重視語言的規範，影响所及是难以估計的，我們不能不对他們提出特別嚴格的要求。电台廣播員、电影和話剧演員，他們也都是語言規範的宣傳家，每天有無數的观众和听众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在向他們学習。他們在普通話的推廣上，过去已經有过很大的功劳，今後在全國範圍內有計劃地推廣普通話的情况下，他們將起更大的作用，自然也就必須加强自己的語言的規範性。

其次，要採取一些行政措施。每年有上千万的兒童進入小学，訓練說普通話应該从他們開始。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成百万的教師是普通話最直接的教学者和宣傳家。教育部最近已經定出一个在各級学校推行普通話方案的草案，不久就会成为正式的方案。我們除了希望这个方案能够切实执行以外，还希望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根本改革漢語的教学，使学生不但在語音方面，而且在書面語言的語法、修辞、邏輯方面都能得到有系統的規範化的教育，消除目前很多学生在中学甚至大学畢業以後还不会說普通話、不会寫通順文字的現象。文化行政部門也应当採取一些措施加强廣播、舞台、电影和出版物語言的規範化，特別是要注意利用廣播电台教学普通話，和在出版机關加强文字編輯工作。

为了促進漢字改革和漢語規範化，語言科学家必須迅速進行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工作。比如說，上面所說的許多工作都同語言的使用直接有關，都需要从理論上了解語言的特點和作用。我們希望語言工作者能够把馬克思主义的語言学的原理和方法应用到現代漢語研究方面來，多做些科学理論的普及工作。社会上目前迫切需要幾部好的詞典和語法書，这是帮助大家正確地使用語言，掌握語言規範的顧問，語言工作者在这方面的責任是重大的。为了推行普通話，方言調查的工作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掌握了方言和普通話的对应關係，才便於有效地教学普通話。这以外还有許多研究工作要做。比如俗話的詞彙和語法的研究，文言的詞彙和語法的研究，翻譯作品語言和外來詞彙外來語法的研究，語言教育的研究，这些也都是直接和語言的規範化有關的。

總起來說，改革漢字、推廣普通話和实現漢語規範化的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設中重要的一环，是一个相当長期的工作。語言工作者，包括从事研究工作的和从事教学工作的，对於这一工作負有特別重大的責任，必須按照“全面規劃、加强領導”的方針，訂出切实的計劃，認眞地通力合作地加以执行。同時，每一个在使用語言文字方面有影响的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也都在这裏边有一份工作可做，有一份責任要尽。只有把專門家的工作和羣众的工作結合起來，才能早日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955年10月26日）

文字必須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

——在全國文字改革会議上的報告——

吳玉章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主任）

同志們！

文字改革——我們这裏說的是漢字改革——是我們國家的一个重大問題，是一个牽涉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複雜的問題。全國語言科学家們，文字工作者們和一切文化教育工作者們，要緊密团結起來，兢兢業業，積極工作，長期努力，才能使这样一个重大問題得到根本的順利的解決。

我們这次会議的任务还不是从根本上改革漢字，而是在漢字改革的正確方針之下，首先解決兩个迫切的具体問題，这就是簡化漢字和推廣以北京語音为标準音的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漢字在我國人民的悠久的文化歷史中有过偉大的貢献，它对於我國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着深廣的影响。漢族从有歷史的時期起，就用漢字作为記錄語言的工具（虽然古代漢字和現代漢字已經有很大的不同）。不但如此，中國近鄰的一些國家，如日本、朝鮮、越南也曾經用过或者还在部分地用漢字記錄他們自己的語言。幾千年來，我國古代的丰富的文献典籍，是依靠漢字保存下來的。漢字直到現在仍然是佔中國最大多數人口的漢族共同使用的文字。在中國共產党所領導的偉大的人民革命事業中，漢字曾經被用來作为向中國人民進行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教育的一項重要工具。在今後一个相当長的時期內，我國進行社会主义建設和改造的偉大事業，在文化教育和生產建設中，漢字仍然將被廣大人民羣众当作一种書寫閱讀的工具而更廣泛地使用，这也是沒有疑問的。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不承認漢字是有嚴重缺點的。漢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一个字一个形体，看了形不能就讀出音，讀出音不能就寫出形，看了形和讀出音还未必就懂得它的意义，因此，必須一个一个地死記住，这就給学習和使用漢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漢字的筆画多數是繁雜的，單拿中央教育部公布的2000个常用字來說，平均每字有11.2筆，其中在17筆以上的就有221个字。我們的小学校，在6年中間，只能学習3000个左右漢字，而且未必能鞏固得了，更說不上完全了解。漢字比較常用的約有六七千个，一个学生不但在中学畢業不容易完全認識，就是在大学畢業以後也还有許多字不認識，还有許多字常常讀錯寫錯。

由於这种情形，学習漢字比学習任何一种拼音文字耗費更多得多的時間；也因为这样，我國現行学制，需要12年才能修完普通教育的学科，比許多國家的学制要延長兩年。我們曾經試办过三年制的工農速成中学，也曾經想把小学改为五年一貫制，事实証明有很大的困难。虽然这不完全由於漢字的难学、难認和难記，但是漢字本身存在的缺點，確实成为兒童教育、成人教育和扫盲工作的沉重負担。

从实用方面來說，漢字使用在書寫、印刷、电報、打字、檢字、索引上面，都要比拼音文字耗費更多的劳動力。製造和使用漢字的打字机、排鑄机、电報打字机和其他各种运用文字的机器，都有很大困难。總的說來，要是保持漢字的現狀，不加以改革，就会嚴重地妨碍人民文

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对於國家工業化和整个國民經济的發展，也会有間接的不利的影响。

中國人民很早就要求把他們自己的文字改成更容易認、容易記、容易寫、容易讀。很久以來，人民羣众就創造出許多簡筆字，並且習慣於用行草書來代替筆画繁多的楷書。近60年以來，隨着中國民主革命运動的產生和發展，文字改革这一問題也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从清朝末年起，一直到全國解放为止，各階級各階層出身的爱國人士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漢字改革的主張和具体方案。很多人为了实現文字改革的主張進行長期的奋鬥。辛亥革命以後所產生的讀音統一和國語运動，漢字簡化运動，國語罗馬字，拉丁化新文字运動，对於漢字改革都起过一定的作用。过去許多年以來無數文字改革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使中國人民認識到文字是可以改革並且必須改革的。他們創造和積累了丰富的宝貴的經驗，对於今後解決文字改革問題有很大的貢献。

儘管我們前輩的文字改革工作者曾經作过長時期的努力，並且有过卓越的貢献，但是在那个時代，要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解決中國文字改革問題，到底是不可能的。这只有在今天，当全國人民已經团結、組織起來，在人民掌握政权、國家完成統一的時候，才会有这样的可能。

毛澤东主席在寫《新民主主义論》的時候，就已經指出：“文字必須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中國共產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正確領導之下，語言科学家、語文工作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团結起來，一方面致力於國內兄弟民族文字的創製和改革，另一方面也尽力於漢字的改革。文字改革現在不止是一种理想，而成为新中國文化建設事業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了。

我國人民已經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確的方向和目标。毛主席在1951年指示我們：“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又指示我們，漢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許多準备工作；在实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時積極進行各項準备。这是文字改革的正確方針。我們这次会議所提出的兩項議程，就是按照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指示的方針確定的。

漢字簡化是为了逐步精簡漢字的筆画和字數，以減少漢字在記認、書寫、閱讀和印刷中的困难。目前漢字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方面在書本和正式文件上用的是筆画繁複的楷書或宋体字，另一方面在人民羣众中很久以來就已經普遍流傳着一大部分羣众所創造的簡筆字和行草書。無論印刷体或手寫体，从形狀筆画來說都缺乏嚴格的規範。这样，在手寫的文字中時常發現所謂錯別字，在書本上也時常發現所謂異体字。漢字簡化的主要目的是要把羣众手寫已成習慣的那些簡筆字用到印刷上面，以代替原來的繁筆字，同時淘汰印刷和書寫中常見的異体字。这样，使漢字的筆画簡化，字數減少，逐步做到漢字有定形、有定數，並且使印刷字体和手寫体接近。在完成漢字拼音化之前的一个相当長的時期內，人民仍然需要用漢字來記錄語言、印刷書刊、教育兒童和成年人。就在实現文字拼音化以後，現在的漢字也仍然有許多人要学要用。漢字簡化，虽然不是根本改革，却可以大大減少学習和使用漢字的困难，並且節省在使用文字時所需要的劳動力，从我國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和文化教育工作來說，这都是一件好事。

在漢字簡化工作中，我們採取的方針，是“約定俗成，穩步前進”。“約定俗成”也就是从羣众中來到羣众中去的方針。很多簡筆字，是羣众的智慧所創造出來的。首先採用羣众所創造、並且为羣众已經習慣使用的那些簡筆字，同時运用羣众習慣使用的那种簡化方法（例如同音代替、草書楷化和減省筆画等）來創造一部分新的簡筆字，这样，我們就可以把一大部分筆画繁複的漢字都簡化了。另外，我們把漢字的某些組成部分——部首和偏旁——逐步簡

化，類推到同一偏旁的漢字(例如把東簡化成东，陳、棟、凍这些字都可以類推簡化。把龍簡化成龙，凡是从龍的字都同样簡化)，这样就有更多的字可以簡化了。

用上述的办法，很多漢字都可以簡化。但是我們不主張一次簡化很多字，我們主張穩步前進。这就是說，不是一次簡化，而是分成若干次，並且每次公布的簡化字，还可以分成若干批推行。今年北京和全國各地報刊試用簡化字，第一批試用57字，第二批試用84字，試用的結果極大部分讀者很滿意。事实証明这种分批逐步推行的办法是很好的。当然，把应該簡化的字一次簡化，从印刷、出版和語文教学方面來說，都比較省事。可是一下子把大批漢字都改变了原來的面貌，許多已識漢字的人讀書看報，一定会感覚到不順眼，不習慣。而且事实上有許多漢字的簡化形式，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確定下來的。先在羣众中間討論並試用一个時期，等到羣众已經熟悉的時候，才正式推行，是比較妥当的。从印刷技術方面來說，鑄造簡化字的銅模需要有一定時間，要一次改鑄大批漢字的銅模，尤其要鑄得好看，也有困难。至於偏旁簡化，一个偏旁類推到許多个字，更应当分作多批逐步簡化。分次分批逐步簡化，虽然需要的時間比較久，但在推行的時候，却比一次簡化順利得多了。

今年一月間，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發布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以後，中央各有關机關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全國各省市文教界人士和人民团体，紛紛組織座談討論。据不完全統計，全國参加討論的共約20万人。此外，我們还从各方面收到个人和集体討論的意見，共計5167件。事实証明，全國人民对漢字簡化工作是十分關心的。从我們收到的羣众意見來看，極大多數贊成用簡化字代替原來的繁筆字。此外，羣众对草案提出了不少建設性的意見。根据这些意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初步修正了原草案，於本年九月，提請國务院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会加以審訂，審訂委員会最後同意了包含512个簡化字和56个簡化偏旁的«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作为漢字簡化的第一步，現在提請会議討論。此外，異体字整理表，經过各地羣众討論，並由中央一級報社、出版社共同審訂，修正補充，現在一併提請会議討論。至於手寫体簡化，根据羣众要求，將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編寫印成範本提交有關机關，供初学習字的人臨摹和参考，因为这方面沒有甚麼重要的爭論，不需要在这次会議上討論了。

这个漢字簡化方案，經这次会議討論通过後，我們拟請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会作最後審訂，然後提請國务院公布。由於这个方案包含有500多个簡化字和50多个簡化偏旁，一下子全部推行，在閱讀習慣和技術方面还是会有困难的。因此我們建議請國务院把这些簡化字和簡化偏旁分批推行。

这一次的方案並沒有包括全部需要簡化和可以簡化的漢字，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用行草書楷化的方法，漢字的偏旁还有很多需要簡化，可以簡化。有一部分已在羣众中使用的簡体字，因为各方面的意見不一致，还沒有完全採用到这一次的方案裏來。此外，羣众还將繼續創造新的簡体字；在这一次方案正式公布施行以後，羣众創造簡体字的过程还会更快些。因此，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將繼續漢字簡化的調查研究工作，經过一年或兩年時間將再行提出新的簡化字表。總之，这一工作將繼續進行，直到漢字簡化工作最後完成为止。

大家知道，漢字簡化並不能根本解決文字改革問題，因此我們还必須同時積極進行漢字拼音化的準备工作。为了根本解決文字改革問題，使漢字走上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需要做一系列的準备工作。从現在起，需要研究和確定一种妥善的切实可行的拼音方案，需要研究漢語詞彙和同音詞的區分方法，需要研究漢語的方言狀況和拼音文字適用於方言區的妥善办法，需要調查研究各國文字改革的經驗，特別是調查研究使用过漢字的國家(如越南、朝鮮、日本等)实行文字拼音化或漢字改革的經驗。这些準备工作，有的我們已經着手作了，有的

在不久的將來就要進行。但是在拼音化的各項準备工作中，有一項最重要的工作，那就是逐步統一漢語的語音，或者更正確地說，使漢語語音在全國範圍內有一个統一的标準，並且逐步擴大这个統一的标準語音的使用範圍。怎样才能達到这一个目的呢？这就必須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为标準音的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我們把这一項工作，作为迫切的具体問題之一，提到这次会議的議程上來，其原因就在此。

当然，推廣漢民族共同語並不只是为了文字改革才有必要，这是有關國計民生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漢語方言複雜，差別很大。不但南方人和北方人通話困难，就是同一个省甚至同一个縣的人們，語音也不一致。在过去一个很長的歷史時期中，我國停滯在封建社会，語言不統一是不容易改变的現象。当我國已在人民民主的基礎上实現了完全的統一，特別是進入社会主义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的偉大的建設時期，这种情况对人民的政治、經济、文化活動的不利就更加突出，而且改变这种情况的条件也完全成熟了。

漢族人民很久以來，就要求一种明確的統一的民族共同語，而且事实上在近幾百年來，这种統一的民族共同語也逐步接近完成。辛亥革命以後的"國語运動"就以統一全國語音为主要的目的。"國語运動"在这一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当時所提倡的"國語教育"曾經使不同地區千千万万的中小学生以及國外華侨，学会了北京語音。近幾十年的廣播、电影、戲劇所用的語音，一般也都採用北京語音，这一事实大大促進了北京語音的推廣。同時，隨着我國近代經济交通的發展和新文化运動的發展，在全國大中城市中已經形成了一种普通話，这种普通話的詞彙和語法以北方話为基礎，而它的語音虽然还沒有做到标準化，但也是在不同的程度上接近北京語音的，因此儘管在廣大農村中和許多方言區的城鎮，方言仍佔着極大的优势，中小学校和工農業餘学校在很多地區仍然用当地的方言進行教学，方言紛歧的情况仍然嚴重，但是漢語目前正在朝着統一的方向迅速發展，却是可以肯定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要依靠國家机關和其他社会力量因势利導，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为标準音的普通話。第一，要在全國的小学校、中学校和各級師範学校中用普通話進行教学。第二，要在部隊和机關中提倡使用普通話。第三，还要把普通話逐步推廣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以便逐步做到漢民族語言的統一。

民族語言的統一，不但有利於社会主义建設，並且也是給中國文字的根本改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工具。只有在統一的語音标準已經普及全國，为全國大多數人民所了解的条件之下，文字的拼音化才便於在全國範圍內比較順利地实現。因此，推廣以北京語音为标準音的普通話，这是一切文字改革工作者所必須重視的。推廣普通話需要做很多繁重的工作，如調查研究全國方言，編輯各种教材，大力培养師資，進行廣泛的宣傳等等。这些是語言科学工作者和語言教育工作者的共同任务，同時也是文字改革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和積極準备文字拼音化，这些都是十分艰巨的工作。只有在中國共產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之下，積極動員羣众，才能完成这些工作。文字改革的事業是人民羣众的事業。沒有廣大的劳動羣众、知識分子、語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以及各界人士的全力支持，文字改革工作的開展是不可設想的。因此我們希望通过这一次全國文字改革会議，全國關心文字改革工作的專門家、学者和一切熱心人士更緊密地团結起來，組織起來，在党和政府統一領導之下，積極工作，穩步前進，貢献我們每一个人的力量，为完成文字改革的偉大任务而共同奋鬥。

同志們！我相信你們一定会接受我这一誠懇的建議。我們的事業虽然还不过是開端，但是我們对於最後的勝利成功是滿怀信心的。祝我們的会議成功！（1955年10月15日）

为中國文字的根本改革鋪平道路

——在全國文字改革会議上的講話——

郭 沫 若

（中國科学院院長）

文字改革是一件大事。教育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召開了这一次的全國文字改革会議來開展有關文字改革的具体步驟的討論，是和整个國家建設事業有密切關联的。請讓我代表中國科学院首先对会議的召開表示衷心的慶賀。

中國文字，主要就是我們目前还在普遍使用着的漢字，作为中國言語的紀錄工具，已經有四千年左右的歷史了。在这四千年中漢字对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文化生活的發展有了很大的貢献。我們的極其丰富的宝貴的文化遺產，絕大部分是通过漢字的紀錄被保留下來的。就在今天和今後相当長的一段時期，我們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中也依然要依靠漢字作为文化教育的媒介和社会生活的交际工具。

漢字具有着光輝燦爛的歷史是有目共覩的事。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歷代祖先为了使漢字能够更好地为社会生活服务，为文化建設服务，是經常在使漢字發生着不断的变化的。由殷代的甲骨文变化到兩周的金文，由兩周的金文变化到秦漢的隸書，由秦漢的隸書变化到魏晋以後的楷書，各种字体在形、音、义三方面，有的在逐漸發生着愈來愈大的距离；再加上各个階段的各种字体都有簡化急就的行書或草書的形式；漢字的確就像一种有生命的生物一样在經常不断地新陈代謝生生不已，有的在適应時代要求而創生，有的也由於不適应時代要求而歸於隱退。

漢字在幾千年的發展中基本上是保守着所謂"象形文字"的体制的，但在实际上是走着音标化的道路。特別在今天語彙的組成起了很大的变化，很少用一个字來表示一个事物，絕大多數的詞是由一个以上的字表示一个事物了。因此，漢字差不多已經成为了純粹的音标，就是表音的符号。但我們所使用的这种表音的符号，數目却未免太多了。就拿教育部所公布的常用字來說，已經就有兩千个，那当然还是不够用的。这和只用二三十个符号的拼音文字比較起來，在繁难和簡易上不是有很大的懸隔嗎？

字數太多，在已經学会了掌握这种工具的知識分子，有的人虽然不会深刻意識到有甚麼分外的不便，或者甚至还有人可能主張"多多益善"；但在初学文化的兒童或成年人，却实在是一道很不容易突破的难關。事实告訴我們，就因为在使用这种艰难的文字，我們在進行普通教育的过程中，比起使用拼音文字的國家來，起碼就要多費兩年。目前是一切都在增加速度的時代，在我們更要爭取時間來提前完成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單是学習漢字就有这样的艰难，这对於我們是多麼沉重的一种負担呢？

我們是多民族的國家，少數民族除掉本民族的言語文字之外，为了同漢民族交往，也还須得尽可能地学習漢語和漢字。而漢字的学習，在少數民族的兄弟們是有更难以言喻的困难了。中國在國际事务中在發揮着愈來愈重大的作用，但在國际間的交往，特別在文化交流上，漢字也是顯著地成为很大的障碍。例如，國际普通使用的科学名詞，在我們就必須另外

制一套，而我們的研究成果，如果不翻成外文，別國的学者也就幾乎無法接近。在这些之外，就在实用方面也还有种种难於克服的困难。單拿打字机來說，在漢字使用的期間，我們就無法使它簡易化。因而我們在工作效率上也就不能不大受影响。

漢字發展到了今天，已經到了非徹底改革不可的階段。毛澤东主席在 1951 年年底曾經給予我們一个明確的指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一明確的指示是幾十年來漢字改革运動的經驗的總結，也是今天和今後全体文字改革工作者、語言学家、教育家和全國人民所必須遵循的一个總路綫。我們必須从各方面來進行必要的工作，來逐步完成中國文字根本改革的重大使命。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在这一方面是做了不少的有益的準备工作的。我們知道，文字改革是有迫切的需要的，但要把漢字从象形文字的体制改革而为拼音文字，却並不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这裏必須有一系列的耐心的細緻的準备工作。究竟应該採取怎样的拼音方案，才是最合理而最適用，这一問題首先就必須加以仔細的研究。即使理想的拼音方案选定了，为使文化的進展不至遭受到天变地異般的突然的变革，我們更可以預想到必然还有一段相当長的時期，讓漢字和新造的拼音文字平行使用，在新文字的逐漸推廣中而讓漢字在大多數人民的日用中逐漸歸於隱退。漢字的歸於隱退，是不是就是完全廢棄了呢？並不是！將來，永远的將來，都会有一部分的学者來認眞地研究漢字，認識漢字，也就跟我們今天有一部分学者在認眞地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样。甲骨文和金文不見使用了，殷代和周代的文化遺產的精華一直被保留到現在。漢字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不見使用了，漢字所紀錄的中國歷代的文化遺產的精華，也必然会一直被保留到永远的將來。

漢字的使用既然不可能天变地異般地突然廢止，那末漢字本身的改革也就成为了文字改革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項準备工作。漢字的簡化——使繁难漢字的筆劃減少，使常用漢字的字數限定，这在相当長的过渡期間，毫無疑問是可以減少一些在使用漢字上所必然遇到的困难的。这一工作在整个國家建設事業上可能發生的有利的影响是決不允許我們輕視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在進行漢字簡化的工作中，已經採取了"約定俗成，穩步前進"的正確的方針；在这一次的会議上又特別把漢字簡化問題作为一項主要的議程提出，更充分表現着实事求是的負責精神。我們希望这一次的会議在这种方針和精神的貫徹中把文字改革委員会所提出的《漢字簡化方案》愼重地加以討論，使它能够及早地成为定案，並使它能够及早地通过一定的手續得到施行。

在这一次的会議上还要討論另一个重要的議程，便是推行漢民族共同語——以北京語音为标準音的普通話。这一議程和使文字走上拼音方向的根本任务是更有直接關联的。中國地方大，民族多，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由於交通的不方便，也由於多民族的頻繁接觸，因而在漢語中形成了很多的方言，驟听起來有些儼然就像不同体系的語言一样。幾百年來，也就是自北京成为中國的首都以來，中國就在逐漸推廣着以北京話为标準的普通話，但那進展的速度是很慢的；而語音的标準化，由於听其自然的漫衍，也很不準確。但在今天，情况大有不同了。我們已經決定要使文字走向拼音化，为了实現这一目的，首先就要要求建立發音比較統一的民族共同語。而在客观条件上，大規模的集体生活和交通的便利更促進了我們的这一要求的易於实現。北京和廣州之間，如坐火車只需三天三夜，如坐飛机更只要幾个鐘头了。中國話在以加快的速度採取着一定的标準音而趨於統一，这是必然的趨势。幾十年來我們的話劇、电影的說白、歌唱和廣播等，都在遵循着这一趨势進行。在目前，留給我們的任务，就是要更加有意識地有計劃地來促進这一趨势的前進。

在語音的标準化上是不是也有困难呢？困难是有的，但並不那麼大。漢語的方言儘管有很大的紛歧，主要就在語音上起了变化，但这方言之間的語音的变化是有一定的規律的，只要掌握了那些規律，相互間的轉变就比較容易。特別在幼年時代，听覺最灵敏，發音器官的筋肉、關節和各种組織最灵活的時候，關於發音的学習是非常容易的事，这和漢字的学習过程就恰恰相反。因此，要推行民族共同語——以北京語音为标準音的普通話，在幼年教育的期間着手進行，就有着非常的便利和必要了。

民族語音的統一是有利於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更要为中國文字的根本改革鋪平道路。我們希望这一次的会議在推行以北京語音为标準音的普通話这一議程上也能够得出一些具体的实施方案出來，促進我們的語音的統一，从而帮助我們中國文字的根本改革。

最後請允許我再說一遍。文字改革是一件大事，这一次的会議是和國家整个建設事業有密切關联的。全國人民和全世界進步的人士都在期待着我們。我誠懇地預祝会議獲得勝利的成就！我誠懇地預祝这样的会議今後能够在相隔不太远的期間內連續召開，逐次討論進一步的改革步驟，由一个勝利達到更大的一个勝利，以至於文字改革的最後完成！

（接 25 頁）動家瞿秋白同志与吳玉章，蕭三和其他一些中國共產党員以及个別的苏联科学家合作在苏联製訂的拉丁化新文字。

魯迅認为瞿秋白同志和其他同志所製訂的那套拼音字母有个很大的优點，那就是它只有 28 个字母，同時拼法也很容易。魯迅非常注意在苏联的中國侨民当中使用这套字母的經驗，並認为这个經驗是完全成功的。瞿秋白同志所提出的字母之所以有價值，因为：这套字母完全是根据語音字母（也就是拼音文字）的原則創製的，它照顧了北方方言的音位結構。易教易学，电報上完全合用。对建立印刷装备和製造完备的打字机都不發生絲毫困难。

中國在应用以瞿秋白同志和其他中國共產党員所製訂的字母为基礎的拼音文字方面，已有足够的經驗。这些經驗应当很好地估計到，可能在标記个別音位方面作些修正，再討論一下标調問題，也就是說調子要不要标記出來；假如要标，那末是不是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都标。但是，嚴格的拼音原則是应用中國共產党員在苏联創製的那套拼音文字所得的最合理的、無可爭辯的、已得到証实的經驗。

我覺得，推荐不大成功並从各方面說都是比較複雜的、按照注音字母類型創立的音綴和字母混合的字母，而不推荐比較合理地創製出來的漢語拼音字母，这是沒有任何根据的。

我再講一講關於漢語拼音文字的字母基礎。根据苏联的經驗，我想，在確立任何文字的字母基礎時，都要考慮到以下幾點：

第一，看哪一种字母体系能正確地表達語言的音位系統，在这裏也就是漢語的音位系統。这是选擇某种字母作为拼音文字基礎時的第一个条件，而且是基本的条件；

第二，所选擇的字母体系在教育学上的價值如何，在某种字母基礎上創製的字母，从教育学上看，有什麼优點和缺點，对於学習語言文字的人來說是不是簡單易学，在应用这套字母時，讀寫教学法的难易情况如何？

第三，在推行新文字時需要什麼样的物質技術基礎，也就是什麼样的打字系統和印刷裝备系統？在电報上运用这种字母能有多少方便和成效？

第四，选擇某种字母体系將促成什麼样的政治傾向？

顯然，这四条基本的标準在为漢語拼音文字最後选擇字母基礎時也应当考慮到。这个問題的解決，以及所有關於漢字改革的問題的解決，当然是漢族人民和他的知識分子自己的事情。

我要用偉大的中國文化活動家魯迅的話來結束我的報告。魯迅的威信就是在討論中國文字問題時也是不可動搖的。魯迅寫道："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覚悟的智識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識者却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騙人，他利導，却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当作自己的嘍囉。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業"❶。

他在另一个地方說："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贊成，是在見了成效之後"❷。

（刘湧泉、阮西湖、陈鹏譯）

---

❶ 《魯迅全集》，6 卷，111 頁。

❷ 同上，117 頁。

对文字改革提三点建議

——在全國文字改革会議上的發言——

陈望道
（復旦大学校長）

文字改革运動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不久就開始的。文字改革运動，在歷史上，是一个浪潮比一个浪潮更加高漲的。今天的全國文字改革会議，可以說是从有文字改革运動以來最高漲的一个浪潮；它是过去六十多年來文字改革运動的總結，也是文字改革运動的理想成为現实的開端。过去六十多年來，進步的知識分子和覺醒了的劳動人民，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文字改革的要求和文字改革的方案，可是都沒有能够達到最後的成功。沒有成功的原因何在呢？是不是由於方案的不够成熟呢？不是的。方案的技術缺點是可以改進的，这不会成为阻碍改革的主要原因。阻碍改革的主要原因是过去統治者的反動和落後，他們懼怕文字改革，懼怕廣大劳動人民掌握文化武器。

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了。中國已經解放，实現了多少年來人民所希望的統一，劳動人民已經做了國家的主人。阻碍文字改革的政治原因已經除去了。在社会主义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的迅速發展当中，劳動人民迫切地要求学習文字和文化。漢字的学習和使用上的困难，跟社会主义經济和文化建設之間的矛盾，已經很突出。我們今天的情况是，既有文字改革的迫切要求，又有文字改革的实現条件，因此，文字改革不再是理想，而將成为事实，这是毫無疑义的。过去多少文字改革运動者長期不能实現的願望，在社会主义時代將得到实現。

漢字簡化方案是我們第一次可以慶賀的收穫。接着，我們在漢民族共同語的推廣工作上將要得到更大的收穫。此外，我們还將有最偉大的一次收穫到來，那就是我們大家最殷切地盼望着的漢語拼音文字的实現。只要我們大家在共產党的領導下努力，一次接着一次的勝利一定会到來。

为了保証文字改革的勝利，我在此地提出幾點当前应当進行的工作的具体建議：

第一，我們要注重宣傳工作和研究工作。我們要为文字改革作更廣泛、更有力的宣傳，这把种宣傳工作看作重要的政治任务。我們希望報紙、雜誌多發表一些關於文字改革的評論和文章。我們希望文字改革委員会和教育部把这次全國文字改革会議的文件編成小冊子，並且編輯簡明扼要的学習提綱，分發給各地学校，文教机構和人民团体，發動廣泛的学習和宣傳。宣傳是保証文字改革成功的必要的工作，我們应当特別重視。

跟宣傳工作相配合，我們应当動員各种研究力量，首先是有關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構，進行文字改革的理論和技術的研究和試驗。文字改革是一件羣众性的工作，也是一件学術性的工作，它应当通过研究和試驗來提高。

第二，为了提高普通話的教学效率，在留声机唱片等听覺教育工具之外，我們需要一种現代的、科学的拼音方案。这种拼音方案最好除了拼寫普通話以外，还有拼寫方音的補充規定，便利方音跟北京音的對应学習。我們希望文字改革委員会早日拟訂出这样的漢語拼音方案，首先作为普通的教学工具，不作为正式的拼音文字。我們希望教育部規定在有条件的各級学校裏設置“普通話”課程，直接运用拼音工具來進行普通話的教学。

漢字教学应当用同一种拼音工具在字旁注音。字旁注音是学習漢字的很好办法，可是，对於推廣普通話來說，僅僅依靠字旁注音是不够的。对於已經認識漢字的人們，要离開漢字，运用拼音工具，才能在普通話的学習中避免受到已經習慣的漢字方言讀音的影响。对於初学文字的人們，也要离開漢字，运用拼音工具，才能在普通話的学習中避免漢字学習進度緩慢的限制。例如，依靠字旁注音的漢字來学習普通話，小学生第一堂課只能学到“開学了”这样一句簡單句子；直接运用拼音工具來学習普通話，在認識字母和練習發音以後，第一堂課就可以学習很多句子，或者一篇短文。离開漢字，直接运用拼音工具，这是学習普通話最有效的方法。

当然，一种現代的、科学的拼音方案，不僅可以用作普通話的教学工具，同時还可以在普通話的教

过程中，通过实踐改進成为完备和成熟的漢語拼音文字。我們知道，任何文字都必須約定俗成。我們的拼音文字如何才能够約定俗成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用來作为推行普通話的教学工具。在廣泛的实用中，它可以逐漸成長和成熟起來，成为大家習慣的，約定俗成的書寫形式。許多对於拼音文字的偏見，在廣泛采用的过程当中亦会逐渐消失。

还有，为了过渡到拼音文字，横寫習慣必須从速养成。漢字横排应当進一步推廣，希望在最近期間之內，做到一切報紙和雜誌全部横排。

第三，文字改革既然是一个羣众性的运動，就必須有羣众性的組織，才能够擴大影响，普遍推廣。我們希望党和政府有領導地首先在大城市建立协助文字改革的人民团体，逐步推廣到中小城市。文字改革的人民团体將來可以發展成为扫盲运動的基本力量。没有人民团体的帮助，文字改革和扫盲工作是不容易在羣众中間擴大作用的。

文字改革是文化革命的基礎。文字改革对於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有極其重大的關係。毛主席早已預言，接着經济建設的高潮，將有文化建設高潮的到來。我們的國家將成为一个有高度經济水平，同時有高度文化水平的社会主义的現代國家。普通話的普及和拼音文字的採用，是一个現代國家不可缺少的条件。我們在全國文字改革会議听了許多位代表的發言，具体地了解到廣大劳動人民是如何迫切地等待着拼音文字的出現。我深信普通話的普及和拼音文字的採用，一定会在党和政府領導下逐步实現，而且一定会在不太長久的明天实現。讓我們大家为促成文字改革的徹底勝利而努力吧！

汉字改革和电报叶务

——在全國文字改革会議上的發言——

朱学範

（中華人民共和國邮电部部長）

我完全同意全國文字改革会議通过的漢字簡化的方針和步驟，即在选定字形上根据“約定俗成”的原則，並適当採用偏旁類推，而在推行步驟上根据“穩步前進”的原則，採取分次分批簡化的办法。对於統一漢語的語音，我同意大力推行以北京語音为标準語音的普通話——民族共同語，为漢字的根本改革作準备。

下面我想簡單談一下文字改革同电報業务有關的若干問題。

我們的希望同廣大羣众的需要，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先簡化漢字，逐步实現拼音文字，以便从根本上解决电報業务中長期存在的困难問題。

用漢字打电報的困难是很多的。这裏我僅举幾个主要方面談一下：(一)由於漢字是方塊个体字，字數繁多，不像拼音文字只有幾十个字母，因此在电報傳遞上造成人力的很大浪費。拼音字母是怎样寫出來就能怎样傳遞过去，对方一看就懂，而漢字就困难了，它在机器上傳遞首先要把漢字譯成电碼的形式，也就是要用四个數目字構成一組电碼，代表一个漢字。現在使用幾千个不同的漢字，就要有幾千个不同的电碼組；对方收到这些电碼之後，还要把它譯回原來的文字，才能看出这份电報的意思。一个譯电人員要記住这樣幾千个电碼，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按照現在一般譯电人員翻譯电報的熟練程度來說，每分鐘抄譯电文十个字，如果每份电報平均三十个字，那麼在一个每天發一万份电報的城市邮电局，在譯电方面，这一万份电報，就得消耗三万分鐘(折合五百小時)；以八小時一个工作日計算，就要有六十多人單純地做翻譯电報工作。同時在收報方面也要同样付出这样多的劳動力。这种譯电的麻煩工作，对於國際之間的电報傳遞，更顯得突出。我們在國外開会或者訪問的代表团向國內發一个电報，新華社的記者向國內報導一篇新聞，外國电報局沒有这种譯电人員，我們要自己譯。如果要報道一份外國文字的新聞到國內來，首先把外文翻成中文，再从中文翻成电碼才能傳遞过來。由於煩瑣的譯电工作，往往一份电報要推遲半天或者長至一天。(二)大家知道，邮电工作最重要的是質量問題，在电報的傳遞中，是不容許出差錯的。但是由於我們的电報文字是由四个數目字所組成的，在質量方面就比較容易出差錯。有些差錯所造成的後果，是很嚴重的，往往一組四个數目字的电

碼，其中錯了一个數目字，意思就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比如一个工廠打电報需要十噸銅絲，銅字是"6394"，如果錯成了"6884"，十噸銅絲就变成十噸鉛絲了，因为"6884"是一个鉛字。又如"0823"是"喜"字，"0828"是"喪"字，"3"与"8"一字之差，一件喜事变成了一件喪事。假如使用拼音文字拍發电報，因为从文字上可以直接看懂全文的意思，就决不会發生这种差錯。（三）在傳遞的時效方面，如果使用拼音文字，效率將大大地提高，節省的人力和時間簡直沒法計算。如前面所說的，一万份电報要費去五百小時的譯电時間，也就是說，一万份电報要耽誤五百小時，收發双方加起來，就是一千小時，大大影响着电報的時效。（四）由於漢字不能在电報机上直接傳遞，因此在电報業务內部也存在許多問題。例如处理報务的机上用語等等，目前还一直沿用着外國語。这种現象是很不正常的。（五）阻碍电報傳遞的机械化受到很大阻碍。

当然，漢字走向拼音化是我們最大的希望。但是这是一項很艰巨的工作，还需要一个相当時期才能实現，目前先实行漢字簡化，完全是必要的。而在漢字簡化階段，对於电報業务也是有很大好处的。首先是漢字筆画的减少，在抄譯电報上，可以節省許多劳力和時間。由於有了法定的簡化字的統一方案，各方面都遵循这一方案使用文字，可以廓清目前一部分使用文字不一致的現象，使电報处理上獲得很大便利，並將减少許多不必要的差錯事故。其次是隨着大量削减異体字，譯电人員可以不必再去記憶許多異体字的电碼了。特别是目前使用的电碼本子，通过漢字的簡化，將獲得很大的改進。現在所用的电碼本子，还是根据《康熙字典》編排的，它有很大一部分單字，已經不是經常使用的了，有些字甚至根本沒有用。由於國家建設事業的迅速發展，人民文化生活的不斷提高，有許多現行的常用字，电碼本裏却沒有包括進去，因此在傳遞电報中有時不得不造字。很顯然，現在的电碼本子，已經不能滿足目前的需要，必須重行修訂。漢字簡化方案的实行，使修訂电報字碼有了極好的根據。当然，由於漢字簡化是分批推行的，在修訂电碼本的技術方面，可能还有些困难問題，但是这些困难我們是可以設法克服的，目前準备为了便利發報用戶翻譯电報，先印行一种《簡化字的电碼撿字表》。

我國自己設計的中文电傳打字机已經初步試驗成功，將可以採用簡化漢字來配製字盤，使字盤相应地縮小，减輕目前設計上的複雜性。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工具，电報是傳遞文字的工具，电報是配合文字來服务的。在文字改革的过程中，电報專業具有一切条件來配合这一工作。由於文字改革这一重大措施有利於國家的建設事業以及人民的文化生活的提高，对邮电事業具有莫大的好处，因此我們全國邮电職工，对於文字改革是熱烈拥護的。我們尤其希望拼音文字能够早日实現。我們全体邮电職工，都願意尽最大的努力，促使文字改革徹底实現。

教科書裏的語言的規範問題

蔣仲仁

（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語文編輯室主任）

教科書是我們國家对下一代進行共產主义教育的重要工具。教科書的內容必須正確；要表達正確的內容，必須用正確的語言。就教的人來說，要憑借寫在教科書上的語言來傳達正確的思想，來傳達各种科学知識；就学的人來說，要憑借寫在教科書上的語言來領会正確的思想，來獲得各种科学知識。假如寫在教科書上的語言沒有規範，不能够使人得到共同的正確的理解，相反的，使人得到的是可此可彼的歧解，是朦朦朧朧的缺少鮮明性的概念，那末，教科書就不能完成它的任务。

我們的國家是一个团結的統一的國家，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党和毛主席領導下，向着社会主义，齐一步伐，共同前進。作为教育的重要工具的教科書，必須与此相配合，依照國家的教育方針、政策，提供統一的教材，在全國範圍之內，進行培养社会主义建設人材的教育工作。因此，寫在教科書上的語言，必須是全民的共同的語言，不应該是、也不可能是那些通用範圍窄小的地域方言——这裏說的語言是指漢民族的語言，其他兄弟民族也有用本民族的語言編寫教科書的，也有用漢語寫的教科書來作翻譯或改寫的根據。

正確的語言，規範的語言，全民的共同的語言，这是編寫教科書的必要的要求。

不光教科書应該这样。就整个教育工作來說，語言是一种教育活動在它的進行过程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工具。没有这个工具，或者这个工具不適当，教育活動就不能够進行，或者受到很大的障碍。在一个学校裏头，教師与学生之間，学生与学生之間，教師与教師之間，假如没有一种規範化的共同的語言，你說你的，他說他的，彼此听不懂，或者听得不十分懂。在这样情况之下，而能够把教育工作做好，这是不可想像的。

我們漢民族的共同語言，很久以來，已經逐漸形成；可是，漢語規範化的要求，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的提出來过，有關規範的問題也没有得到明確的解決。教科書的編輯工作就碰到过漢語在口头上的方言分歧在書面上的某些混乱，这都給教育工作和教科書編寫工作帶來不少的困难。

由於現代漢語的規範不明確，編寫教科書用的語言没有可以依据的準則，書面語言的某些混乱現象不免也反映到教科書上來。有的教科書，在語言上有時还沿用一些非現代的"文言"的詞彙和語法，有的教科書选取苏联教材在譯文上用一些非漢語的生硬的外語成分。不少学生反映，从这样的教科書上不容易得到鮮明的確切的理解；不少教師反映，用这样的教科書來進行教学，有時不得不花一些功夫來作語言上的講解；甚至有人这样反映过，正是由於这种語言的講解，有些小学竟至於把歷史課地理課也都上成語文科的講讀課。其所以这样，教学方法的不適当要負責任，教科書語言上有缺點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种情况讓教学工作的質量直接受到不少的損害。

漢語没有明確的規範，小学語文教科書受到的影响更大了。小学語文教科書是用來教兒童学習語言的。用什麼語言來教給兒童，这种語言的語音、詞彙和語法有哪些基本的重要的規範，什麼算是合乎規範的榜样，什麼算是違反規範的錯誤：这些問題都是編寫小学語文教科書的先決問題。

就拿选用詞彙來說吧，現在还没有一本标準的詞典，連一个标準的詞彙表也找不着，往往为了幾个等义詞的选擇，何去何从，大費周章。例如，親屬的称謂各地不同，教科書应用了北方話的"爺爺"、"奶奶"、"姥姥"，好些地方的教師都來信，有的說他們不懂，有的說他們听不慣，並且責問編者为什麼不用他們当地習用的称謂。假如没有一个标準的詞彙，假如都要滿足各地方的要求，那就势必只能拿"祖父"、"祖母"、"外祖母"这样的超方言的文言詞彙來教給兒童了。有些东西各地的名称不一样。"玉米"、"苞穀"、"苞米"、"棒子"，教科書上究竟用什麼好呢？或者都不用，只用"玉蜀黍"，讓各地方教師用当地的名稱去翻譯，这样办，好嗎？即令这样办，也需要有个規範把它確定下來。

語法方面遭遇到的困难也不下於詞彙。第一關就碰到詞的界限的問題。建立詞的观念是語言教学的第一步。什麼是詞，什麼不是詞，議論虽多，可都没有成为定論，足够作为分詞的标準。教科書上也講到詞，也选了一些例子，可是这些例子只是那些顯而易見的估計起來不致發生疑問的來做个标本。一面选，一面捏一把汗，生怕学生在例子以外提出問題，不僅教師不能回答，教科書的編者也不能回答，請教語言学專家也不能肯定地回答。詞法上和句法上的問題也不少。一直到今天，漢語的詞類究竟有幾類，哪幾類，辨識詞性靠什麼标誌，詞性的变化有什麼規律，漢語句法的結構怎样，有哪些成分，……这些个問題，眞所謂"聚訟紛紜"，甚至於連一句話裏什麼是主語什麼是賓語都未成定論。这种情况障碍了把漢語当做科学用它的規律來教育学生的这个重要工作的進行，也就降低了語文教学的質量，無怪許多人都要慨歎学生語文程度的低落了。

語音方面由於方言紛歧，教学上也有不少困难。教科書上的注音是按北京語音來注的，可是一些細緻的問題，如"讀音"与"語音"的問題，声調問題，輕声問題，兒化問題，連字变調問題，也都没有明確的規範可以依据。教科書上的注音，有的地區的教師把它"視同具文"，仍然照他們自己的方音念，有些教師对於方音和标準音的对应規律不能掌握，念得"南腔北調"。小学語文科对民族共同語的形成和推廣本來負有重大的任务，可是由於語音規範的没有確定，这个任务不能很好地完成。

社会主义建設，五年計劃，加給文化教育建設工作的任务是艰巨而迫切的，其中，加給語文教育工作，加給提供語文教育工作以主要工具的教科書編寫工作的任务，也是艰巨而迫切的。以上提出的这些問題，總的說來就是漢語的規範問題已經到了不能不解決的時候了。

我們的党和政府对这个問題一直十分關怀和重視。早在1951年6月就在《人民日報》上提出了《正確地使用祖國語言，为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的号召，同時組織領導、鼓勵語文科学机關和語文科学工作者展開了研究的工作，做出了不少的有益的成績。最近，連續召集了兩个有關的会議，全國文字改革会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学術会議，作出了關於漢語規範的重要決定。

全國文字改革会議通过了"大力推廣以北方話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为标準音的普通話——民族共同語"的决議。有了这个决議，我們的語言，口头的和書面的(当然包括教科書在內)就有了明確的規範，全國漢族人民都得按这个規範來說、來寫，就語文教育工作說，得按这个規範來教，來学。至於漢語規範的許多具体工作，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学術会議也通过了決議，要有計劃地有步驟地開展起來。

漢語是一种丰富的、精密的、优美的語言，是一种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簡直不能設想，这样一种語言它本身是沒有規範的，或者它的規範是不可知的。問題在於人的努力，在於科学研究的工作，在於教育推廣的工作。有了党和政府的領導，有了語言学家，語文工作者，語文教育工作者的协同努力，有了人民的拥護，漢語規範的工作一定能够迅速地得到成功。

和漢語規範化的同時，对記錄漢語的文字——方塊漢字的改革，全國文字改革会議也通过了決議。依照毛主席的指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实現拼音化以前，要做許多準备工作，其中簡化和整理漢字是重要的一項。会議通过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提出的《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異体字整理表草案》。这种措施对語文教育工作來說，意义是重大的。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号。要通过語言來教給兒童的东西，因为認識这个符号很困难，不能不受到限制。"貓""雞""学校""讀書"这些个詞，有的是兒童已經熟習了的，有的是应該教給兒童的，可都为了这些字筆画多，难認識，用在第一冊課本的時候，大費躊躇。課本上出現"工人"可以，出現"農民"就得考慮。为什麼？"農"字密密麻麻的，13筆，难。漢字不光形体複雜，还有許多不必要的贅瘤——異体字，於是难上加难，給教師和学生增加了不少的負担。由於識字难，識字的量就不能不減少，識字的速度就不能不放慢。这还不要緊，难就少識幾个。可是，嚴重的是憑借这个符号來教語言，通过語言來教兒童掌握知識，識字旣少，掌握知識的量和速度也就不得不相应地降低了。

現在簡化了一批字，廢除了一批異体字，这对識字教学的裨益是不小的。不用說，教科書上首先就採用。当然，有的教科書受到印刷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全部採用，因为一時沒有足够的銅模；有的教科書受到供应時間的限制，不及立刻採用，因为要供应全國用不能不提前出版，如明年春季用的教科書現在已經出版，簡化字就不能全用進去。可是，只要技術条件許可，如新編小学語文課本是用手寫製版的，就立刻全部採用，不僅採用个別簡化的字，而且採用偏旁簡化的字。这样一來，对教学質量的提高是有帮助的。不要以为一个字多兩筆少兩筆沒什麼大不了，从識字教学來看，从千千万万兒童学習識字來看，这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件大事。

漢字的根本改革是拼音化。方塊漢字和拼音文字在教学上的利弊是十分懸殊的。苏联小学的語文教科書和我國小学語文教科書就是一个鮮明的对比。苏联小学階段是四年，語文科單是閱讀的課本(語法課本还不計算在內)譯成中文就有80多万字，我們小学階段是六年，語文課本(此外並沒有語法課本)一共不過25万字。这不是一个形式上數字的問題，而是內容上丰富与否的問題。造成这个懸殊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能不說是文字的难易的不同。又用我們國家盲童用的語文課本和正常的兒童用的語文課本來比較一下。盲童用的課本因为是拼音文字，它的內容比正常兒童用的課本还要丰富。盲童是用觸觉來識字的，得用手一个一个地摸，学習条件比正常兒童差得多。可是，就因为一种是用拼音文字，一种是用方塊漢字，学習情况就有这样的差别。

漢字的改革一定要走拼音化的方向，这是千眞万確，無可怀疑的。当然，改革不是一蹴可就，可得赶快邁開步子。目前漢語的規範化，普通話的推廣，簡化字的採用，異体字的廢除，都是走向漢字根本改革的準备工作。这个工作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教育工作者，为提供教育工作以教材的教科書編輯工作者，应該向着这个目标邁步前進。

(接32頁)常常覚得那作家竭力要避免常用的字眼，而代以另一个我們所料想不到的。这样所得到的效果一定会跟所要達到的相反。凱撒是一个很偉大的作家，他曾經提醒我們要防止这种心理。他告訴我們：作家要避開罕用的字眼正如水手要避開水底的暗礁一样。

我想用一些具体的文藝作品來証明我在上边所說的这个断言。我曾經就幾个偉大的罗馬尼亞作家的文章作过一些統計，所得結果我覚得是完全有決定性的。他們所使用的詞彙絕大多數是由基本詞彙構成或者顯然是由这些基本詞彙派生出來的。比方米海尔·厄米涅斯古，誰也不能否認他是我們的最偉大的詩人(他於前一世紀末葉寫作)。他所使用的詞，不屬於基本詞彙的通常沒有超过百分之四、五，並且这些詞的本身还不是那通用的語言中最罕用的。

由此可見，一个作家把那些古語的、區域性的、各种行業的專門名詞倶可能減縮到最低限度將更能够創造出一些为全民族所接受的作品。同時，这样他將能为語言的統一作出他的貢献，使这种語言能够成功地發揮它作为全社会所有組成員的交际工具的作用。加強基本詞彙，把它常常应用在文藝作品裏面，可以使詞彙，从而使整个語言更为穩固。一种堅固地構成的統一的語言將是全國团結的宝貴的要素。(岑麒祥譯)

关于中國文字的几个問題

——在全國文字改革会議上的發言——

謝尔久琴柯

（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苏联顧問）

一

目前，中國科学家所特別關心的大的語言学問題有以下三个：1.在中國建立和推行統一的漢語普通話的規範；2.改革漢字；3.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的語言和幫助他們創造文字。

人民中國这个偉大的多民族國家的文化革命事業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上述这些最重要的問題的正確而又迅速的解決。正因为如此，中國共產党中央委員会，中國人民領袖毛澤东同志和人民政府，才这样多地關怀民族語言問題。

今年在北京要開三个語言学学術会議（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学術会議，全國文字改革会議和民族語文科学討論会），这三个会議將从本質上帮助解決許多在人民中國裏有全國性意义的民族語言問題，同時將大大地从各方面促進理論研究工作的廣泛開展，促使中國語言学工作獲得新的、有決定意义的高漲。

为此，作为苏联語言学家的代表，我願意对人民中國語言学工作現在正開始着的極大的轉折表示眞誠的喜悅和深切的滿意。在人民中國，和在苏联一样，科学是为人民服务的，在人民的中國，科学理論的發展現在是与解決社会的重大实踐任务緊密联系着的。

我在此預祝我們最親近的朋友，科学工作中的战友——中國的科学家，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全中國社会人士在解決民族文化建設的問題上，首先是在解決民族語言的問題上獲得最大的成功。

文字的歷史是同語言的歷史及創造和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歷史緊密地联系着的。文字是在已經存在的語言的基礎上產生着和發展着的，它同時也就開始为社会的需要而服务，但它不是基本的，而是附加的、輔助的交际手段。沒有語言社会是不存在的。語言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文字的產生比語言晚得多，它是在人民有了需要把話傳達到远地（空間上）並把它在時間上（社会歷史上）固定起來的那个人類社会發展階段上產生的。因此，文字在人類社会裏的基本功用就是藉助特殊製定的書寫符号來表達語言。

書寫符号体系的用途在於倶可能好地表達人類語言的全部特徵，某一具体語言的所有特點。

文字是为人類社会服务的，它应該促進社会發展，促進社会文化教育的發展。如果某种文字再不能滿足社会的要求，並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上不能促進羣众文化的迅速提高，从而阻碍着羣众文化和教育的普及，成为人民和國家的社会經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發展的障碍物的話，那末，这种文字通常是要讓位給另外一种比較完备的文字，即应当改革。

文字改革可能只涉及字母和正字法的个別成份，而保留原來的所有字母和正字法的基礎，这样的改革在俄罗斯文字的歷史上不止一次地進行过。文字改革也可能是根本的改革，这就是为了追求提高人民文化教育的这个基本目的，因而犧牲舊有傳統而用完全另一套字母和正字法体系澈底代替舊有的一套字母和正字法体系。苏联許多过去使用阿拉伯文和老蒙文的民族的文字改革都是这样的。就在不久以前，越南也作了根本的改革，越南用拼音文字代替了舊的表意文字，从而使得越南民主共和國居民当中的文盲迅速地消滅了；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國的情況也是这样：曾阻碍羣众文化普及的舊的表意的書寫体系被朝鮮民族的、在拼音字母基礎上建立的文字——諺文所代替了。在日本也用音節文字的体系代替了表意文字。

目前在人民中國也提出根本改革文字的問題，用一种比較現代的、当然要照顧語言特點的拼音文字代替傳統的表意文字体系，藉助这种文字，可以在較短的時期達到全國人都識字，達到高度的文化高漲以適应中國共產党中央委員会，主席毛澤东同志和人民政府領導的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任务。在漢字改革方面，毛澤东同志曾指示說：“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有些同志在“語言革命”和“文字改革”中間画上了

符号。这当然是不对的。語言和文字不是同一个东西。斯大林同志指出，語言的發展不是用消滅現存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的方法，而是用擴大和改進現存語言基本要素的方法。斯大林强調說："語言从一种質过渡到另一种質不是經过爆發，不是經过一下子消滅舊的和建立新的那种方法，而是經过逐漸的長期的語言新質和新結構的要素的積累，經过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來实現的"❶。

斯大林同志堅決地摒棄了認为語言發展史上必然有突然爆發、即"語言革命"的語言發展階段論的这个非馬克思主义的理論。但是，斯大林同志在这种情况下講的是語言，从來没有把語言和文字看成一个东西。文字体系是書寫的假定符号的体系。甚至，在圖画文字的階段，人們使用的圖画字也絕不是藝術形象，而只是假設圖样的記号。作为不大發展的人類社会中的一种文字体系的圖画文字，在它發展的初期就不同於繪画藝術，因为繪画藝術的特徵是以对世界的藝術象徵的認識來影响世界。

代替圖画文字的任何文字体系都是可以看得懂的、假定符号的体系。任何表意文字，任何音節文字以及任何拼音文字也都是表達口語的假定的体系。任何字母表上的字母完全没有任何藝術表現功用，它只是假定的書寫符号，用來表達最簡單的語音單位（音位）並屬於一定的書寫体系，一定的字母文字或拼音文字的体系。

一种假設的書寫符号体系可以大胆地用另一种來替換，而这絲毫也不会伤害語言。語言保留着所有自己的規律，不至因为一种文字体系被另一种替換（比如說表意文字被拼音文字替換）而在語言裏產生任何改变。我們是不会發現"語言革命"的。因此，把文字改革同語言發展階段論的荒謬理論同等看待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当文字改革对人民極端需要的時候，当文字改革对实現國家文化革命的任务必不可缺的時候，没有任何理由害怕文字改革。

二

普通語言学方面的文字史和文字理論的問題，很遺憾，語言学家們都很少來研究。叙述具体的文字体系的歷史的著作，特别是叙述方塊漢字歷史的著作稍微多一些，但是在其中一些著作裏，尤其是西歐出版的一些著作裏，常常可以碰到一些完全不正確的观點，跟馬克思主义關於文字產生的歷史以及文字在人類社会發展的早期階段上的性質的看法相矛盾。關於方塊漢字起源問題也没有得到正確的闡述。

远在1937年，在巴黎出版了張正民的一本專著《漢字和人的手势》(L'ecriture chinoise et le geste humain)，在这本專著裏作者力圖証明方塊漢字是由所謂"手势語言"產生的，因此，漢字是在人類社会有声語言產生的很早以前產生的。丹麥的学者万·金湼肯(Van Ginneken)，在他的著作《人類古語在典型学上的構拟》(La reconstruction typologique des langues archaïques de l'humanité)(巴黎1939年)裏依据張正民的材料，企圖証明由"手势語言"不僅產生了文字，同時也產生了有声語言。

斯大林同志堅決譴責了这一類的反馬克思主义的观點，因为"有声語言或字的語言始終是人類社会唯一的能作为人們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語言"❷。（重點是我加的，格·謝尔久零柯。）

文字不可能出現在人類社会真正的語言——有声語言之前。因为文字的創造和运用是以人們有了發展了的思維为前提的，而語言和思維是不可分离的，思維没有語言是不能实現的。因此，文字在語言產生以前是不能存在的。正像以上我所講过的，文字只能是有声語言的一种輔助的、附加的人們交际的手段。文字是用來把話傳達到远处，把話固定在時間上的。当然，漢字的情况也是这样，它只能在社会發展的一定的、比較晚的階段上，当着在已經高度發展了的人類思維与語言的基礎上產生了書面交际要求的時候才出現。

据我了解，虽然張正民和万·金湼肯的論點在國外文獻中傳播得相当廣泛，但是在中國的刊物上还没有人揭露它們的反馬克思主义的实質。

三

在漢学文獻裏，还散播着一些与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原理相矛盾的其他論點。不容爭辯：文字是表達語言及其个别形式与結構（藉助它們表達我們的思維內容）的書寫手段。因此，文字体系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麼样的語言成分（完整的句子，各别的詞，音節，語音）由特殊的書寫符号來表示的❸。

由此我們就应該作出結論：在講到表意文字的識别符号時，如跟圖画文字作比較，重要的不在於：我們在表意文字裏看到的是表意符号的假定形式而不是用圖画表示的表意符号的形式，重要的是在於：書寫

❶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25頁。

❷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46頁。

❸ 關於这个問題，請参看伊斯特林娜的論文《文字理論的幾个問題》，《語言学問題》雜誌1953年4期，109—121頁。

符号——表意文字在这裏不像圖画文字似的表達完整的句子，而是表達个別的完整的詞或是詞的独立部分(可能是音節)。所以，說表意字（包括方塊漢字）不是表達單詞而是概念（观念，思想）是不正確的。

如果說，某种書寫符号能直接表達概念、思想、观念的話，那就是說，在文字与思維之間可以存在不依靠語言的直接的联系，换句話說，沒有語言思維可以实現，沒有語言可以思想。斯大林寫道："不論人的头腦中会產生什麼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麼时候產生，它們只有在語言的材料的基礎上，在語言的術語和詞句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和存在。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和完全沒有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实'(馬克思)。思想的眞实性是表現在語言之中。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能談到与語言的'自然物質'不相联系的思維，才能談到沒有語言的思維"❶。

概念始終是在詞中形成，在詞中鞏固下來。任何概念只有靠詞來表現、形成和固定而存在。由此很容易得出結論，任何書寫符号，包括表意字、方塊漢字，都不能避開語言独自"表示"、表達概念。任何書寫符号，包括方塊漢字在內都是标記表示概念的單詞，而不是表示彷彿不依靠詞而存在的、在詞以外存在的概念本身。

象形文字的維護者們力圖証明，方塊漢字表達的正是概念，而不是詞，在这方面他們常常拿中國的方言分歧做口实。他們說，各个漢語方言的代表們在談話时有时可能互相不了解，但是，同时他們都能同样好地理解用方塊漢字所表達的观念、概念。这好像說，表意文字有特殊的作用和方便。这些議論当然都是不对的。

的確，在中國各个方言之間存在着不少的詞彙的差別，使得現在各个方言(北方方言、吳語、粤語、閩語、湘語、客家等等）的代表們之間在口头交际上發生困难。可是，問題完全不在於：方塊漢字能表達概念，因而各个漢語方言的人都可了解。問題完全不在这裏。方塊漢字能够表達的只是詞，它們所表達的詞，在許多漢語方言裏發音不同，但是标記的是同样的概念，这些詞，如我們平时所說的，有同一意义。

在漢語每种方言的範圍內，某些漢字标記、表達那些存在於这种方言裏的一定的詞。这些詞就其意义來說是一致的，而就其語音組織來說，有时是不同於由同样一些漢字所表示的其他方言裏的詞。

在漢語裏"詞"的概念和"方塊字"的概念都是用"字"來表達，这不是偶然的。方塊字即是"漢字"。在人民的意識裏"字"这个術語被了解为詞的記号，即漢語的詞的記号。

与这种在方言分歧的漢語环境內使用方塊字的現象有些相似的現象，我們在國际通行的表意字，即表意符号方面，也能看到。拿阿拉伯數字來說，講各种不同語言的民族都使用它。然而，"5"这个數字，俄罗斯人理解成數詞"пять"的表意記号；漢人理解成單詞"五"的記号，越南人理解为單詞"năm"的記号，法國人理解为單詞"cinq"的記号，德國人理解为單詞"fünf"的記号，朝鲜人理解为單詞"다섯"的記号，英國人理解为單詞"five"的記号，等等。

各个民族的語言中的數目字仍然表達着一定的实际存在於这些語言之中的詞，这些詞在这种語言裏以它的語音組成區別於另外一种語言，但是表達的是同样的概念，有着同样的意义。

这样一來，規定表意字本質和象形字本質的問題，应当加以根本的修正，这样的修正从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观點上講是有原則性的和方法論的意义的。契科巴瓦教授編著的課本《語言学概論》对表意文字的本質所下的定义虽然流傳很廣，但不正確："文字表達概念，不管这些概念是怎样命名。这就是表意文字（希臘詞idea—思想，观念)的原則"❷。这种說法也应修正。从这个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似乎文字可以脫离語言，不依賴語言來"表現"概念。關於这一類定义的錯誤性我已經說过；契科巴瓦教授編寫的課本所以用了这样的定义，很可能是由漢学文献裏找來的。

四

文字所表達的語音的和詞彙語法的特點，往往規定文字本身的性質：表意文字，音節文字，拼音字母文字(换句話說，語音的或字母的文字)。

为了証实这个論點，我們再回到方塊漢字上來。方塊漢字在中國存在得这样長久的原因是什麼呢？

这可以由以下兩个原因來解釋：（一）漢語的特點，它的詞彙語法的規律性；（二）中國本身以及漢族社会經济和政治發展的特點。这些特點決定了迄今还存在的漢語多方言現象以及各方言間那些主要是語音和詞彙方面的懸殊差異。

儘管幾千年來，漢族創立了高度發展的文化，但是直到最近我們在中國还沒有看到認眞的、有廣大的全國性反应的、把表意体系的文字改为拼音字母文字

---

❶ 《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38—39頁。

❷ 契科巴瓦：《語言学概論》，莫斯科，國家教育出版社，1952年版，175頁。

的嘗試。

方塊漢字的表意文字过去能够有效地表達古漢語詞根分立結構 (корнеизолирующий строй) 的詞彙語法特點。漢語中各种語法形式和語法範疇形成時，漢語詞幹是沒有变化的。至於談到現在大部分已用作接詞的各种小品詞，那它們在最近以前是被了解为实詞，或半实詞，因此这些小品詞也完全可以用方塊字表達。

但是，漢語構形成分的發展現在是無可怀疑的。因此，現代漢文裏的方塊字已經不僅僅是表達完全独立的"有意义的"詞類，而且还表達構形成分，卽助詞、接詞，这样也就接近了一般的語音符号。

不久以前，在朝鮮的所謂"漢字混合体"裏也有过類似的过程。这种文字用漢語的方塊字表達有意义的詞根部分，而接詞則用朝鮮拼音文字(諺文)來表達。同样的过程在越南文(安南文)和日本文"假名"中也有过，与使用方塊字同時，还使用音節字母文字(日本)和拼音字母文字(越南)。的確，文字的表意成分和字母成分的結合在朝鮮和日本表現得更加鮮明，更加現实。

当然，不能把古漢語的詞根分立結構以及現代漢語的詞彙語法結構看成只能和表意文字密切联系，看成漢語只能用表意文字。漢語許多方言的語音結構，特別是在漢民族語言的發展上起着基礎方言作用的北方方言的語音結構早就研究了，漢語各方言的声調系統也研究了。如果在創制新漢文時，只需要照顧結構的、詞彙語法的特點，那麼对創制漢語拼音文字当然不会有什麼特殊困难了。

語言裏存在着詞根分立的語法結構和形态不够發達的情况，表意文字当然可能在很長時期以內發展和使用，例如在中國。"可能"，但完全不是非得只有它(表意文字)存在才行，它"可能"，但不一定必然存在。在这样的条件下，採用拼音文字也可以有成效的。

但是在中國还存在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直到最近它还嚴重地使过渡到拼音文字的工作遭遇困难。也正是这个最後的原因造成了基本的困难和阻碍。这个原因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漢語的多方言現象和方言間語音和詞彙方面的懸殊差異。

为什麼直到最近中國方言間的嚴重分歧还保持着呢？当然这只能从解放前漢族人民生活所經歷的歷史条件找到解釋。

毛澤东同志用以下的方式說明了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他寫道："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济是封建的經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經济之反映的佔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國資本主义侵略中國，中國社会又逐漸地生長了資本主义因素以來，中國已逐漸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❶。

中國的变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貪汚透頂的買办資產階級作用的增長和加强，所有这一切一方面推延了國內封建主义的瓦解和消滅，另一方面大大地阻碍了民族資本主义的發展，同時也阻碍了民族共同語在國內的確立。

甚至第一次在中國使工人階級出現在政治舞台，並帶有鮮明的民族解放性質的，有名的"五四运動"，由於以上的原因，仍然把反对本國封建主义和外國帝國主义作为基本口号。

毛澤东同志在估計"五四"运動的歷史意义時指出：它是徹头徹尾、毫無妥协地反帝國主义的，徹头徹尾、毫無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制度一直保留到共產党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才告結束。这自然旣嚴重地阻碍了漢民族本身的形成，又阻碍了民族共同語的確立以及全民的漢民族語言統一規範（不僅是書面形式的而且是口头形式的)在各地的推行和使用。

漢族形成为統一的民族这一巨大歷史过程的完成，應該說是發生在中國人民为反对內外反動派而進行的民族解放鬥爭的時期。

中國共產党团結了基本的人民大众为中國國家的独立，为建立牢不可破的民族团結，为統一的漢民族政治、經济和文化生活的自由独立的發展而鬥爭。

因此，只是由於中國共產党的領導工作，漢民族完全統一的过程才告完成，漢部族才最後形成为新型的統一的民族。中國共產党及其領導在中國歷史上的最偉大的功績也就在此。

無疑的，也正是在人民中國的時代，在建設新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時期，偉大的漢民族統一的語言規範才正在完成着它們的形成和鞏固的过程。中國沒有經歷一般的所謂資本主义發展的"經典的"形式。所以，漢語裏到現在还有許多嚴重分歧的方言和很多的小方言。

在中國，統一民族和統一語言的形成过程完成得較晚，直到最近还沒有確定的、普遍的、中小学校和高等学校都要学習的漢語普通話統一規範，还沒有民族的标準規範語言这一高級形式——这也就說明了漢語的地方方言还未能在統一的語言裏被磨掉，还沒有

❶《毛澤东選集》2卷635—636頁。

失掉自己的一些独特性。

在嚴重的方言分歧条件下，在缺乏統一的普遍通行的普通話，特別是缺乏統一的讀音規範的情况下，当然表意文字是一种方便的，可以說是“超方言的”文字。

一般說來，那些沒有根据嚴格的一定的方言語音而以表意为基礎所制定的文字，特別是在具有各种不同人种成分的居民的國家裏，被認为是最方便，最能够(即使是藉助文字符号)团結居民，更正確點說，是团結这些居民中能掌握表意文字的那部分居民。表意文字長期保存在缺乏全民語統一規範的地方，並不是偶然的。

但是在不同的時代裏，在不同的民族裏，表意文字一般是複雜的、难以掌握的。除去社会主义政治条件之外，表意文字是使那些使用它的民族普及識字教育和提高文化遭遇困难的重要原因。

中國周圍的一些國家，如朝鮮，日本和越南，許多世紀以來所使用的表意文字由於非常複雜和困难而在这些國家裏引起了拒絕使用表意文字和轉用較簡單，較容易掌握的現代的文字，主要是拼音文字的运動。

下面这一事实是很有意义的：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同志在宣佈越南独立的第六天，1945年9月8日号召在拼音文字的基礎上迅速扫除文盲，並絕对地拒絕在越南繼續使用表意文字。文盲、居民文化水平的低落阻碍了自由、独立國家的迅速前進。因此，胡志明同志正確地宣佈：消滅文盲的鬥爭和反对帝國主义的武裝鬥爭是同样重要的。胡志明同志說：“这个敌人（文盲、居民的文化水平低落——謝尔久琴柯注)的危險，不下於法國侵略者”❶。

大家知道，越南民主共和國很有成效地消除了文盲。不要忘記，越南語和漢語的結構是相近的。

國家的社会主义發展，工業化和農業生產合作化政策自然要求在人民中國以最高的速度提高所有居民的文化水平，首先是扫除文盲。

我們应当時刻記住偉大的列寧的話：“没有文化的人是站在政治之外的”❷。

中國的表意文字曾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这是众所公認的。它不僅促進了漢族文化的發展，而且也促進了亞洲其他各國(越南、朝鮮、日本)人民文化的發展。但是在國家發展的現階段，它已經不能滿足人民重要的生活需要，國家領導上也注意到这一點，因而建立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並批准了举行这次会議。毛澤东同志曾指出漢字改革应走的道路，即創立拼音文字的道路，这条路是唯一正確和必要的。

但是，漢語拼音文字的創制只有在確立並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使用統一的漢族全民普通話的条件下才能進行。

实行这个重要的措施(確立和推行普通話)必須和实現漢字改革的措施緊密联系起來，可以这样地說，要使表意文字过渡到拼音文字，必須在鞏固和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全民普通話的基礎上進行。

看來，旣要愼重地準备文字改革，也要愼重地準备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統一的全民普通話。这些措施实現得越快，國內文盲的消除和全体居民文化政治水平的顯著提高也就進行得越快。

“超方言”文字的可能和無害地存在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民族國家（尤其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發展的，团結新的、社会主义類型的民族的國家）發展的時代要求那些在活的人民口語基礎上和在一定的方言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民族語言有丰富而全面的标準地發展。

自然，在这些新的条件下，“超方言”的表意文字必須讓位給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可以鞏固和在全國推行統一的普通話(口头的和書面的)中的詞和各种短語的独一發音，同時，它还可以促進这种全民普通話的進一步發展和丰富。

漢族人民的利益要求在現在制定新的、比較合理的文字体系。然而，这絕不是意味着优秀的漢族文化遺產，丰富的漢族古典著作因而就要被遺忘了。

不，一點也不会这样。这些遺產照舊將由專家們來研究，其中的优秀作品逐漸地通过翻譯的方式为廣大人民羣众所了解。

应該承認：古典遺產無論多麼偉大，但是，不認識字的人，甚至文化程度低的讀者都是讀不懂的。文化和教育的普遍高漲，普及教育，全体居民積極参加新生活建設——这些無疑地將会喚起羣众更多地關心研究國家和民族的过去，研究幾千年來天才的，勤劳的漢族人民所創造的那些偉大的文化珍宝。

对於学問很好的讀者，对於教育普及的國家來講，研究人民精神文化的优秀文献，是没有特殊的困难的，不管这些文献是用什麼文字寫的。

但是应該達到这样高度的人民羣众文化的高漲。为此，应該採取堅決的步驟，首先是在文字方面採取堅決的步驟。

---

❶ 見《中國語文》16期，19頁。

❷ 《列寧全集》，33卷，55頁。

我認为，在解决漢字改革以及解决实行文字改革的日期和速度等問題時，还不能不照顧以下这兩个很重要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在中國这个多民族的國度裏，漢語是各民族間的交际語言。当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少數民族应該和学習本族語言一样学習漢語。然而，方塊漢字給三千七百万少數民族学習偉大的漢族語言的問題造成了巨大障碍。在学習漢語上，不应有任何人为的困难。漢族的社会政治、藝術、科学、教育及其他著作应当在非漢族讀者当中，首先是在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当中(不管他們是那个民族)獲得廣泛普及。重要的是要保証非漢族居民学習漢語和学習那些用漢語寫的並帶有新中國先進思想的东西。

表意文字在这裏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它使得國外——与中國友好的國家，尤其是东南亚各國人民——学習漢語並且可能利用新的、社会政治及其他漢語著作遭遇到困难。非常複雜的文字使学習漢語和普及优秀的漢語著作遭遇到困难，从而也就削弱了偉大的漢族人民的語言的國际作用和意义。看來，所有这些，在解决漢字改革問題時都应該考慮到。

五

結合上面所談的，我想特地談談中國偉大的作家魯迅对漢字的一些十分有权威的評論。

毛澤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論»一書中对魯迅的功績作了評價。他寫道："魯迅，就是这个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学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是在文化战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敌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决，最忠实，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❶。

魯迅在他的言論中不止一次地涉及到漢字問題。他有些文章，如«門外文談»、«關於新文字»是專門來談这些問題的；在«阿Q正傳»俄譯本的序中，在«中國語文的新生»以及其他一些雜文中，也曾談到过方塊漢字。

魯迅在評定方塊漢字時，總是把它当作"难以掌握和非常複雜的文字"❷。

魯迅在指出方塊漢字早就不是一目了然的象形文字時正確地指出，有些詞是画不出來的。他寫道："但寫字究竟是寫字，不能像繪画那样精工"❸。

如果在篆字圓折中还有圖画餘痕的話，那麼从隸書到現在的楷書，由方塊字所表達的意义和形象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礎並未改变"❹。

在从圖画字發展到表意字的歷史过程中，圖画公式化了，簡單了，变得認不出來了。因此，孩子們不得不"憑空一个一个的記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並不簡單，例如鸞、鑿去叫孩子寫，非練習半年六月，是很难寫在半寸見方的格子裏面的"❺。

方塊字屬於表意文字体系，因而它不依靠語言的眞实的語音基礎，自然也就不能照顧到詞的發音以及漢語語音本身在漢語存在的幾千年过程中曾發生了巨大变化。

所有这一切迫使魯迅說了这样的話："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应該感謝的，但在形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声的諧声字的現在，这感謝却只好躊躇一下"❻。

文字和語言是人民創造的。但文字和語言不同，它在人類社会發展的一定階段上，並不是全民的遺產。魯迅寫道："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攬"❼。隨着社会的發展，学習文字的人的範圍也擴大起來，但大抵限於特权者。普通老百姓是不識字的。因为他們被認为不配掌握文字。因此，魯迅寫道：文字好像已成一种神秘的东西。一种要特別尊敬和崇拜的东西，掌握文字的人不願意放棄由文字知識帶給他們的那些特权。魯迅寫道："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对於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多，也会損伤神秘性的"❽。

但是魯迅正確地批評道："我們中國的文字，对於大众，除了身分，經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門檻：难。單是这条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❾，跨过这条門檻的就成了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認为自己有权使文字更加难起來。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般平常的士大夫之上"❿。魯迅坚信，方塊漢字本來複雜，但那些不關心人民文化普及的人們故意把它弄的更複雜了。

魯迅指出："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着不尊嚴了"⓫。偉大的中國作家

---

❶ «毛澤东选集»，2卷669頁
❷ 見«阿Q正傳»俄譯本序言。
❸ 見«魯迅全集»，6卷93頁。
❹ 同上，39—94頁。
❺ 同上，94頁。
❻ 同上，94頁。
❼ 同上，97頁。
❽ 同上，97頁。
❾ 同上，98頁。
❿ 同上，98頁。
⓫ 同上，99頁。

迅坚决主張改用拼音文字，他指出：中國还有十分之八的文盲，不能“为了保存漢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國人作文盲來殉难”❶。

魯迅在《中國語文的新生》一文中寫道：“但我們中國，識字的却大概佔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这还能說文字和我們大家有關係麼？”❷

魯迅指出：倘要生存，就要除去“阻碍傳佈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他又寫道：“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❸。

魯迅認为：方塊漢字，中國的劳苦大众是沒有学習和学会的可能。甚至那些出身於富裕階層的人，費一二十年的工夫，終於学不会的也多得很。魯迅寫道：反对拼音文字的人故意地“抹殺了方塊漢字本为大多數中國人民所不識，有些知識階級也並不眞識的事实”❹。掌握漢字要費很長時間，因而也就沒有留下什麼時間來深入研究現代科学各重要部門的知識。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到八日的晚上國民党匪帮槍殺了二十三个革命者，其中有五个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文学作家：白莽，柔石，胡也頻，馮鏗和李偉森。就國民党匪帮的万惡的卑鄙行为魯迅寫了一篇优秀的、極其鮮明的文章：《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学和前驅的血》。在这篇文章裏，在給中國無產階級及保衛無產階級利益的革命知識分子的敌人那种卑鄙行为和罪行打上烙印之後，他还涉及到漢族文化教育問題，他寫道：“我們的劳苦大众歷來只被最劇烈的压迫和榨取，連識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滅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們不能有自修的机会”❺。

这样看來，魯迅曾不止一次地反对那种难以解釋的論題：說什麼表意文字好像能团結整个漢族人民。魯迅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時期，正是方塊漢字使劳動人民的教育普及遭遇到困难，也正是方塊漢字横在劳動人民文化和政治發展的道路上，因此他才这样熱烈提倡中國採用新的拼音文字。

我觉得，在我們这个会議上回憶一下傑出的思想家，新中國民族文化的战士的下列名言，是非常恰当和及時的：“倘要中國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众語，大众文，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❻。

魯迅關於漢字改革的許多經过周密思考的意見在現在听起來还是很令人信服的。

六

魯迅不止一次地坚決主張为漢語創造字母的、嚴格語音的，換句話說，語音字母文字。那時有些人指定“注音字母”來代替漢字，魯迅認为“这是不行”❼，因为，它究竟不过是簡單的方塊字，跟日本字母相仿。魯迅認为，“注音字母”能起次要作用，而作統帥是不够資格的，它們“寫起來要混雜，看起來要眼花”❽。魯迅从“注音字母”的複雜性和这套字母的作者沒有放棄表意文字傳統等方面看到了这一套字母的基本缺陷。“……那些字都还很繁瑣”❾，这是他在《關於新文字》一文中所指出的。

的確，魯迅是正確的。任何按照注音字母類型創造的漢語字母方案都要給字母表添上許多符号，用这些符号一方面表示声母，另一方面表示韻母。

有些同志把按照注音字母類型建立的漢語字母体系解釋为好像是漢語的特點——声母和韻母的顯著劃分。但是，要知道，韻母在漢語裏並不是最簡單的語音單位。韻母在任何漢語單詞裏，假如它不是僅由一个語音(音位)組成，它裏面可以有幾个各別的、不可再分的語音單位(音位)。換句話說，在漢語裏，在它的任何方言裏很容易確立在詞中有區別意义作用的基本語音(音位)系統。

正因为如此，我認为在文字改革時，对漢語來說，最容易而又最合理的当然是創制一种嚴格拼音的、語音字母的文字。为什麼要在半路停止，为什麼在这方面不合規律地引証漢語的“特點”來製造某些緩和剂的治标法呢？如果嚴格实行語音字母的原則，那麼在漢語字母表上一共將有 28—29 个字母，也就是說比按照注音字母類型創立的字母要少得多。

28—29 个字母的字母表，正像魯迅正確地指出的，“容易学，有用，可以用这对大家說話，听大家的話，明白道理，学得技藝，这才是劳苦大众自己的东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❿，学会 28—29 个字母所需要的時間当然比学会那种按照注音字母類型創立的字母所花的時間要少得多。

也不能忘記：在有了簡單的合理制定的字母的条件下，才能最合理最容易地建立起現代的印刷業、印刷技術、打字、电報，文字教学法。

魯迅非常欢迎 30 年代初由中國共產党著名的活

（轉 13 頁）

❶ 同上，105 頁。
❷ 同上，115 頁。
❸ 《魯迅全集》，6 卷，116 頁。
❹ 同上，162 頁。
❺ 《魯迅全集》，4 卷，267 頁。
❻ 《魯迅全集》，6 卷，109 頁。
❼ 同上，102 頁。
❽ 同上，102 頁。
❾ 同上，162 頁。
❿ 同上，162 頁。

关于文学語言規範化的几个問題

——在現代汉語規範問題学術会議上的發言——

鄂　山　蔭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親爱的同志們：

我想首先向中國科学院致謝，感謝邀請我來你們偉大的國家訪問，親眼看看你們偉大國家的人民正以無比熱情爭取在和平条件下建設社会主义。我願意向这次大会祝賀，並祝大会獲得成功。

在漢語文学語言規範化会議日程上的問題对我們來說絕对不是陌生的。相反地，这些問題是我們所理解的。因为，類似的問題在苏联我們曾碰到过，並且現在也还在發生。比如說，就在今年六月，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还举行了俄語文学語言及其規範化問題的会議。苏联語言学家和漢学家对这次会議的工作發生强烈的兴趣，这是很自然的。

我認为自己在漢語規範化問題上不够內行，因此請允許我在我的發言裏，同大家交流一下我們語言学家在苏联各民族文学語言規範化方面的點滴經驗。我过去主要是搞詞彙問題，所以我下面就只談这方面。

一

文学語言規範化的問題是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產生的：这个問題只有在已經形成民族語的条件下才能產生。民族的統一，共同的經济生活的鞏固，國內各地區之間联系的發展，統一的教育系統，民族文学的傳播等等，这些都制約着文学語言的最大限度的社会作用。这一社会功能的擴展也就自然引起科学的規範化問題的提出。

在俄國这个問題約在二百年前就產生了。不僅是从普希金開始，甚至在他以前就有許多人講过或是寫过有關俄語文学語言規範，甚至有關俄語規範化的問題。但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語言学家除了少有的例外，都只局限於記錄这些規範，只是登記一下个別作家的語言中或某些社会階層的話裏的一些不合規範的現象。爭取文学語言規範化的鬥爭在革命前的俄國是不够積極的，而且組織性也不足。

在苏維埃時代，俄語文学語言規範化問題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問題，並採取了積極的鬥爭形式，爭取語言的正確性和準確性，爭取有效的建立語言的标準規範。不是作消極的旁观者，而是作爭取語言純潔的战士——这就是新型的苏联語文工作者。

中國人民在偉大的中國共產党的領導之下已經建立了自己統一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漢民族語成了社会主义類型的偉大民族的語言。还在中國革命勝利的最初幾年，漢語文学語言規範化的問題就成了中國共產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注意的中心。党和政府号召全中國人民为正確地运用祖國語言，为祖國語言的純潔而鬥爭。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把这个問題全面地提出來了。因此，依我們看，这次提出文学語言規範化对中國來說是完全及時和完全必要的。

二

其次我們認为，整个文学語言的規範化以及詞彙的規範化（局部的規範化）只有在取得大量集体經驗的基礎上才是可能的。在十月革命以後的短短的時期裏，俄罗斯民族走过很長的發展道路，变成了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設、文化革命、科学和技術的提高以及文学藝術的發展，俄語詞彙在这短短的过程裏得到了从來沒有过的發展。拿我們的文学和出版物來說吧。任何現代文藝作品的語言，任何報紙論文的語言在詞彙方面都反映出苏联人民在內战和外國干涉時代为保衛年輕的苏維埃國家所經歷的全部战鬥过程，反映出苏联人民在恢復國民經济和完成我們的各个五年計劃時期所經歷的全部战鬥过程；現代俄語詞彙反映着我們的人民和軍隊为使人類擺脫法西斯主义所進行的英勇鬥爭，反映着我們战後時期的社会主义建設，我們社会主义的現实。

在十月革命以後的時期裏，進入俄語詞彙的那些新詞是由早已存在於俄語構詞法裏的手段構成的。俄語中有由語义構詞法形成的新詞，也就是說，由用舊

表現新內容的方法所形成的新詞。例如“коммисар”詞，就是这样的詞，这个詞現在已經不表示机關地區的長官，而表示一个团体中的党的領導者。有加結尾部的方法構成的那些为數很多的新詞，比 ударник(突擊隊員)，скоростник(高速工作者)，бач(農村圖書館管理員)。有用元音把詞根或單詞联起來的方法而構成的複合詞，如 птицеферма(养雞農)。还有 комбайн (联合机、康拜因)一類的外來語或际詞彙的借用。所有这些使詞彙丰富的手段都沒有越从前的俄語文学語言構詞規範的範圍，也沒有引構詞法新模型的創立。

这一任务对苏联一些兄弟民族的語言來說，是比困难的。这些民族同俄罗斯族手挽手走过了全部鬥和勝利的道路，他們的詞彙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是这些語言的詞彙的發展有时走了曲折的道路。例在苏联各民族中的一些突厥語支的語言裏就曾廣地借用过阿拉伯和波斯語的詞。曾借用了 инклаб 來示“革命”，иктисат 表示“經济”，джюмхурият 表示和國”等等。其中許多詞对該民族來說是異己的，众所不了解的，並且是活的口語裏不用的。与此相在某些共和國因为要反对濫用外來語，就發生了正当的徹底排斥外來語的現象。所有的外語借詞包俄語借詞在內都無情地受到了清洗，代之以自己的彙，甚至於在新詞不能準確地表達所需要的概念時，这样做了。比如，在卡拉卡尔帕克語裏，为了表達“革”这一概念就曾强加运用“аударыспак”，这个詞实質当“改朝換代”講。这种現象曾發展到令人發笑的地比如在这个時期还出現了一个寿命不長的術語йтан-арба——(鬼車)來表示“自行車”。

社会主义文化的成長、学校教育網的發展、文学的展、和主要的是那些团結在統一的大家庭裏的各民的接近——这些都使文化珍宝得到廣泛交流，同時俄語詞彙和國际詞彙(特别是科学技術和社会政治面的術語)受到普遍採用。但是，目前那种由一种具語言提鍊出來的民族的構詞法是詞彙發展的最重要源泉。

英勇的中國人民的經驗，中國工人階級、農民、識分子所走的战鬥道路，对確立漢語文学語言規範有重大的意义。中國人民生活中發生的各种巨大的化，中國人民为民族和社会解放所進行的鬥爭，中國民为建設新社会基礎所从事的辛勤劳動都反映在漢的發展上，首先是反映在漢語詞彙的發展上。漢民文学語言的詞彙的發展，科学技術術語及其他新詞的增加，簡直一日千里。生活每天都在產生越來越的新詞。这些新詞大批地來自先進生產者工作隊、工廠、農業合作社、科学院、中小学校和大学。在中國解放前有誰知道“鋼材”、“輪耕制”这样的術語呢，但是，这些術語現在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个公民常用的嗎？所有这些新的詞都是要在科学上加以綜合的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是人民的偉大集体劳動的成果，足以影响漢語文学語言的規範。我們知道，在这方面你們曾做了許多工作並進行着更多的工作：《新名詞辭典》的出版和在《工人日報》上对五年計劃中新術語的解釋等等，就是一个很好的証据。你們語言中那些極其丰富的構詞手段能够順利地应付生活提出的任务。跟俄語一样，漢語中有些新詞是由舊詞表達新概念的方法構成的，有些新詞是由加結尾部的方法構成的，还有些是以漢語所特有的詞根組合法構成的。用上面这些方法構成的新詞，呂叔湘先生已举出很多例子，我就不再举了。此外还有一部分新詞，是用詞類轉換的方法構成的，比如，“丰富”原來是形容詞，現在变成了動詞，又如“意味”原來是名詞，現在加上“着”（“意味着”）也变成了動詞。上面所列举的構詞手段和格式是漢語構詞法裏早就有的。弄清構詞法中派生的類型和格式是文学語言規範化工作当中的重要部分。

三

現在，我來談談我們苏联如何处理方言詞彙和古語問題。苏联过去有些人有一种看法，認为使用方言詞彙就是用民間的成分來丰富俄語文学語言。从我們工作实踐中得出这样一个結論：必須大力扶持基礎方言的詞彙規範。这一結論在三十年代高尔基的許多有名的言論裏明顯地表示了出來。在这些言論裏，高尔基堅決反对使用方言詞彙、同行語和區域詞等等來堵塞文学。在現代的俄罗斯文学裏，对話中勉强还可以使用方言詞彙当作一种修辞手段，但是也要少用。

凡是熟悉蕭洛霍夫《被開墾的处女地》一書中舒卡里老头兒的人，都会很容易地想像到：方言詞彙在什麼限度以內能算是眞正的藝術表現手段，足以補充描寫作品裏的人物。但是，諸位大概都知道，連蕭洛霍夫也在他作品的新版裏作了很多修改，使人物的語言擺脫許多多餘的方言詞彙。除去修辞方面有使用方言詞彙的必要之外，我們總是把方言詞彙算作堵塞我們的文学語言的成分。大力扶持民族語的規範，扶持它的基礎方言——始終是我們詞彙規範化工作中的基本原則。

固然，有時我們不能不脫离这个原則，但是每一次都要有充分理由。有这样一种情况：一种語言的方言相互差別特别大，並且講这些方言的人又特别多。假如这种語言沒有文字，那麼可以有个例外：为了扫除文盲，有時要建立兩种文学語言。例如莫尔多瓦苏

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國現在就有兩种各以一个方言为基礎的文学語言。

但是，我再重複一遍，只是在一种語言沒有文字的時候，我們才这样做。如果这种語言有文字並且早就有用这种文字創作出來的文学，那麼大力扶持基礎方言的这个原則，卽使在方言非常分歧的情况之下，也是我們必須要遵循的。例如，烏茲別克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其次，在这个地方也应該談談另外一种情况：如果基礎方言詞彙裏由於沒有这种东西而缺少方言裏所有的詞，那麼就不得不吸收它們。比如，基尔吉茲文学語言在進行規範化時，是採用北部方言作它的基礎的。在这个基礎方言中沒有那些和植棉有關的詞（在基尔吉茲北部不种棉花）。但是在基尔吉茲南部，植棉業却是國民經济的重要部門，因此，很自然地，相应的單詞就从南部方言進入了基尔吉茲語的民族詞彙。

这样的現象在俄語裏也有。比如，現在我們書報上常常碰到 путина（漁期）这个詞，从來源上講，这个詞是區域詞。

我們对待古語的态度也是这样的。我們沒有一个人为了《彼得一世》这部長篇歷史小說的語言而責备阿列克塞·托尔斯泰。这部小說在人物語言裏使用的古語是廣大讀者所容易瞭解的，並且是眞正的藝術表現手段：这部小說人物的語言把讀者帶到了作者所描寫的時代。但是，在雅茲維茨基的歷史小說《露西國王依万三世》裏所用的古語，那些不懂古俄語的讀者就很难看懂。因此，这部小說的語言曾遭到我們報章上的批評。

總之，一个方言詞的普遍性，或一个古語，运用的頻率是規定我們讓不讓它在現代俄語文学語言詞彙裏佔有合法地位的主要标準。这又要取決於科学研究。

在中國，大概这兩个問題都比在苏联尖銳得多。第一，由於國家經歷过長期的封建割据，地域方言之間的分歧是很大的。其中一些方言甚至还有自己的文藝作品和戲劇。各方言与民族共同語抗衡的現象还相当大，而方言詞彙又很容易滲入文学語言。第二，中國在很多世紀以來就有一种舊的文学語言（文言），这种文言是根据古代全民漢語並經过許多語言藝術巨匠琢磨加工而保存下來的。这不算什麼例外，有書面語言的地方都是这样。舊中國文化不普及，也使文言免於遭受發展着的全民共同語的規範和方言的滲入。还有，文言的基礎和最近幾个時代發展起來的全民文学語言有共同根源，这一點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有这一切到現在还便於文言詞滲入現代漢語文学語言之中。这些文言詞，部分是丰富現代漢語文学語言，但經常是起了堵塞作用。这裏的情况跟古露西的情况相同：露西的古斯拉夫書面語在全民共同的文学語言的發展中就曾起过这样兩种作用。跟印度各語言的情况也相同：印度的梵文到現在还在繼續影响着印度各种新文学語言的詞彙。

因此，我認为，研究現代文学語言裏詞彙單位的普遍性和使用頻率，对任何一种文学語言的規範化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四

苏联的科学家根据自己的工作經驗，深信文学語言規範化的問題应当在嚴肅的研究工作基礎上解決，这牽涉到文学語言的各方面——正音法，詞彙，語法，修辞，方言学。如果科学基礎不够，那麼關於文学語言規範化的一切議論都是空洞的，並且只会引起不必要的、沒有結果的爭論。我拿土尔克明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國的工作經驗作例子來說明这个問題：土尔克明沒有对方言語音的特點作必要的研究，因而拖延了土尔克明文学語言的規範化。文学語言中应該確定的全部規範应当在实驗中檢定，首先应当用基礎方言的材料檢定。

在这方面，我对中國的專門文献知道的很少。但是下面这一點对我來說是毫無疑問的：像尖团分不分、声調和重音現象、"兒化"問題、用字的特點、某些語法形式是否常用、方言詞彙和古語的普遍性等問題，所有这些都应該有系統的研究和考慮，因为只有这样，才不僅能够及時記載已經肯定的規範和标出它們中間所發生的变化，而且能積極地影响这些規範。

因为这个緣故，所以我們在苏联以極其兴奋的心情讀到了陸志韋教授的《北京話單音詞詞彙》和已故的白滌洲教授的《關中方音調查報告》，这些著作証明中國同志們也注意到这些問題；也因为这个緣故，在我們研究漢語的工作中，实驗研究法開始逐漸佔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为了举例說明这个問題，这裏可以提一提我們年輕的漢学家那些已答辯过，但还沒有發表的学位論文：M. K. 魯勉茨夫的《主語副句与独立單句間的語調比較》，И. H. 戞里茨夫的《漢語的音位系統》。我想，最近以來使你們特別注意的語言学基本理論問題，有林漢達教授的文章中特別廣泛提出來的那个詞的界綫問題，还有曾举行过討論的漢語詞類問題，作者曾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宝貴材料。我相信，許多其他問題都將在深入的科学研究基礎上被你們徹底解決。沒有科学基礎，就不能有規範化，就不可能寫出大的漢学巨著。

五

現在再談談術語問題。創製術語是一个很大很

鍵的問題。各个科学、技術部門的專家在創製新術語工作中起很大作用。至於統一術語，那麼在这个問題上，各个國家机關要起很大作用。

在十月革命以後的時期，我們各共和國通过由最高苏維埃或共和國部長会議設立的專門術語委員会進行了統一術語的工作。它們編輯了一种“名詞術語未定稿”,这种未定稿分發到各有關机關以便提出修正和意見，限期是半年左右。後來把这些未定稿再收集到術語委員会，委員会研究建議和修正意見，並根据它們提出自己的結論。最後由委員会通过的術語表在官方的公報上發表，讓大家採用。

我們从中國同志們的著作中得知中國正進行着巨大的名詞術語工作。但是我們記得，像“火柴”这个很普通的概念，在各地方就有四种表達法，讀音不同还不算在內：“火柴”——全國通用，“取灯兒”——北京話(在蒙古說“取灯子”)，“洋火”——北方通用，“自來火”——上海及整个东南地區通用。

在《中國語文》雜誌38期發表的林燾同志的文章舉出“輪船”一詞在不同方言中就有三种不同說法，等等。这說明目前中國術語統一的問題是特别尖銳的。这裏，还要特别研究哪些要統一和哪些还可以不進行統一的問題。目前，在有集中的國民經济的条件下，当然術語統一的工作將会更快、更順利進行。

六

最後，我还想說的是：只有在現存的規範最後固定在詞典裏的時候，任何文学語言規範化的工作才可以被認为是完成了。但是，远不是所有的字典和詞典都能具有这种意义。例如，上一世紀六十年代俄罗斯出版的、而現在苏联还再版的達里詞典不僅包括十九世紀中葉俄罗斯文学語言的詞彙，而且还有許多地方方言、土話和同行話等等。这样的詞典不是規範性的詞典。但是，苏維埃時代的規範性詞典——烏沙柯夫詞典、奧熱柯夫詞典、苏联科学院出版的《現代俄語文学語言大詞典》(剛出版幾卷，尚未出全)都具有極大的規範意义。这样的詞典是廣大人民的最宝貴的参考書，它們在推行俄語發音、正字法、詞彙、語法和修辞的規範方面，起了極大的作用。

我在中國出版的詞典上花了很多功夫。我不打算談那些經典的古詞書，它們都是中國各个時代詞典編纂者的巨大劳動成果，並对讀者，例如讀古文的人，有很大帮助。另外幾部在中國出版不太久的大詞典也是服务於这个目的的，它們一般是解釋古書和新名詞的。《辞源》和《辞海》是我們每个漢学家必需的。我們很珍視符定一的十卷集的《联緜字典》，它是研究古漢文不可少的参考書。《國語辞典》在我們那裏也得到了極高的評價。但是，我們覺得到現在为止，中國还沒有一部記錄現代文学語言規範的詞典。接近这類詞書的是《國語辞典》，但这部詞典从它所选用的字和詞彙來講，甚至在出版的当時，也不能認为是規範的。首先它包含了很多古語，这些古語很难說是現代語言的組成部分。例如，这部詞典 4104 到 4105 頁的“殺”字。这兩頁上所列举的詞和語彙有多少可以使用在現代文学語言裏呢？我認为很少。同時，这部詞典裏的古語也沒有任何專門标誌。在那裏，我們也找不到那种指明某个詞是否是書面語或口語中一个詞彙單位的标誌；除了少數例外，沒有指出詞的方言來歷，沒有講它的修辞上的特性，也沒有說明它的用法。在詞典中我們也找不到所查的那个詞的語法特性。所有这些都大大降低了詞典的價值，削弱了它的規範化作用。

除了上面講的以外，还要加上一个要求，也就是对今天还在使用方塊字的漢語詞典的要求。中國的規範性詞典，只有在詞典裏每个詞都有正確註音時，才能成为眞正規範性的詞典。有了这样的註音才能正確地決定一个詞的讀音，指出它的标準發音。《國語辞典》在某些方面优於先前出版的那些詞典：《國語辞典》裏每一条都有註音，而先前出的那些詞典不是都有的。但是，我認为《國語辞典》裏的註音系統还不能在足够的程度上用來固定詞的發音規範。为什麼呢？

在漢語詞彙学問題研究上所獲得的經驗告訴我們：重音的存在是漢語詞彙的一大特徵，这种重音在一定的情况下又能把幾个由語法联系着的詞劃分出來，而且一个詞組的重音系統还能够标誌出：一个詞組在語法上和語音上是一个統一的單位。如果从这种觀點來看《國語辞典》的註音系統，那我看，就完全不够了：在詞典中沒有記上重音，也完全沒有顧及四声的互相影响。这还不算，《國語辞典》裏也沒有指出：这是一个独立的詞，还是一个詞組，或是由詞組縮減而成的詞。換句話說，《國語辞典》沒有提供出必要的材料，帮助在一种具体条件下解決詞的界綫問題。我們明白，最後这个問題是漢語詞彙学中最根本、最困难的問題之一。但是規範性詞典应該提供具体解決这个問題的一切必要材料。

我們熱烈地希望中國不久能出版一部漢民族文学語言規範詞典。我相信，这样的詞典將大大推進各國的漢語詞典学的工作。那時，中外文詞典將要在应有的水平上出版，旣將有利於中國人民学習外國語，又將有利於各國人民学習現代漢語和研究你們偉大國家。

上面所談的，只是一些个别的見解，这些見解远远沒有包括你們工作的廣闊範圍。讓我再一次感謝你們給我这样一个机会在这个会議上講了这些話，並讓我祝你們工作成功。(吳樂、陈鵬譯，刘湧泉校)

关于單一的民族語言

——在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学術会議上的發言——

格拉烏尔

（罗馬尼亞科学院院士）

这是一个众所週知的事实：民族的最突出的特徵就是它的語言。光从外部的記号看來人們往往不能認識一个人是从哪个地區來的，更無从知道他的經济利益或思想方法，但是只要他一開口說話，人們就能知道他是哪一个民族的。同時，語言也許是民族的最穩定的特徵，人們很少能够隨意決定把它改变。可是在1950年以前，人們对於民族語言和它与方言的關係的問題却很少注意。斯大林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裏第一个很清楚地提出了这个問題。他强調地指出："馬克思承認必須有統一的民族語言作为最高形式，而把低級形式的方言服从於自己"❶。

根据斯大林的見解，苏联的語言学家曾廣泛地討論了对整个民族社会是統一的和共同的民族語言和地域方言間的關係。他們用不同的具体事例表明了怎样產生方言的集中和作为民族語言基礎的方言是根据什麼条件选出的；比方說，在法國和英國为什麼民族語言是以首都的方言为基礎的，而在意大利和保加利亞却选了另一个地區的方言做基礎。由於某种理由基礎方言还不能確定的時候，苏联的語言学家就决定态度，推荐那最有机会变成普通使用的方言。

这也是众所共知的事实：在人類史中曾經有过統一的時期和分化的時期。在原始公社時期氏族語言有分裂成为幾种不同語言的傾向；在奴隸制度時期有过方言的集中，某些語言擴展到了寬廣的地域；在封建制度時期方言又再起分化；在資本主义時期語言的統一佔优势。但只有在社会主义時期才有眞正的語言的統一，古代方言的差異只留下了一些模糊的遺跡。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不可能有完全的統一，因为資產階級用來分离劳動羣众的措施之一就正是要增劇各地區間的紛爭。比方多少次我曾听見他們說，在法國，眞正的法語不是在巴黎說的，而是奥尔雷安或波哇济野的；又多少次我曾听見他們說，在罗馬尼亞，眞正的罗馬尼亞語是在边远的地區說的。这种想法对於某些作家对民族語言的态度不是没有影响的。

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另一个对於語言統一的更重的阻力就是農村羣众的文化落後。这有利於土語的保存，甚至增强了各地域間的語言的差異。在社会义制度下，城鄉間的矛盾一步一步地減少，最後只下了一些較不重要的差別，大大有利於語言的統一。

民族語言和文学語言間的關係怎样呢？为了回这个問題，我們要把不同時期區别開來。当然，在族感情沒有出現以前，我們談不上有什麼民族語言可是就在古代，就有了一种全社会共同的、統一的言，所有方言都服从於它，作为这种統一的語言的派。古代希臘可以給我們最明顯的例子。在那裏，个城市都有它的帶有文学形式的土語。在法國，直十四世紀，文学中採用的还有幾种方言。在别的方，類似的情形也不是沒有的。在某一个時期，由一些比較容易看出的理由，一种方言佔了其他方言上風，用途開始比較廣泛，它虽然也受了其他方言或深或淺的影响，結果却甚至成了唯一的文学語言比方希臘的阿狄克方言和法國的法蘭西島方言都是样。隨着時代的進展，共同的語言成了民族語言，步一步更与文学語言相類似。

这意味着共同的語言起初只是一种抽象：共同希臘語之所以存在，只因为希臘的各种不同方言都出於一个共同的來源的，只因为它們有着非常重要共同的特徵，甚至有着頗为相同的發展規律。所以这个時候，共同的語言只是親屬方言的總和，只以些方言的形式而存在。反过來，在我們这个時代，同的語言，民族語言，通常却是一个具体的事实，为它一步一步与文学語言相類似。这文学語言是容易識别的，因为它不与任何地域方言完全相同。着社会的發展，民族集体統一的文学語言代替了共土語的書寫形式，就逐漸擴展到全國去；另一方面廣大的劳動羣众，从前还只是一些文盲，現在很快

---

❶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1953，12頁。

了教育，坚決地由使用土語轉移到使用文学語言，就構成了統一的民族語言的一个顯著的進步。

無論是为了加强民族的团結还是为了文化的發展，这都是一个極端重要的進展。就这个观點看，語言家的責任怎样呢？当然，語言是一种客观的現象，們不能按照任何个人的意志而把它改变。有時候有想試做一下，但一切嘗試都可悲地失敗了。但是这不意味着我們就应該無動於中地看着語言發生变化。認識到了它的發展的方向，認識到了这个發展方的重要性，語言学家就有可能並且应該作出貢献，速这些有用的發展的進程。在这样的場合下，看到語言的某种形式一步一步地擴展，在最近的將來会成全國語言統一的和一般的形式，語言学家就应該起責任帮助語言促快地走完它的中間的階段，完成的統一。这不只是一件業务上的工作，並且是一种國的責任。

就我对於材料的非常淺薄的認識看，我覚得中華民共和國的人民在这時候完全有理由把这个問題交給中國的語言学家。民族語言的問題在中國是極端要的。有些西方的語言学家認为有幾种漢語，因为語的不同方言間的差别相当大，以致使用这些方言人不能互相了解。这种錯誤的主張就政治的观點看非常危險的。誰說有幾种語言，就是在原則上說有个民族。有幾种漢語存在就是为把中國分裂成幾个家辯護。以为能不能互相了解可以給我們用來做區一种語言的兩种方言和兩种不同的語言的标準是不確的：在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我們很容易到一些使用某种方言的人不能为他們同民族而使用一种方言的人所了解。可是人們从來沒有說过有兩法語，兩种德語等等。反过來，一个保加利亞人和个俄罗斯人虽然各自使用着自己的語言，却相当容達到互相了解；可是沒有人能够主張俄罗斯語和保利亞語構成一种語言。

區别方言和語言的主要特徵，那是同一种語言的种方言承認共同語是最高的單位，而这兩种方言構它的从屬的單位，至於兩种親屬語言却不服从於任更高的語言的單位。一方面，譬如法語等的方言，們都是法語等的支派；另一方面，譬如俄罗斯語和加利亞語，它們在目前不能承認有任何更高的單。法語的方言現時朝着語言的單一形式集中，而俄斯語和保加利亞語却各有它們的不同的發展方式。人們脫离一种語言，採用另一种語言的時候，哪怕有親屬關係的，也一定要中断那延續性，就是要完脫离那第一种語言，完全採用那新的語言；可是脫离一种方言，採用同一种語言的另一种方言（或者採用民族語言），人們通常却只分階段，採取連續过渡的方式來進行：起初採用一个特點，其後又採用另一个特點，如此等等。因此我相信我們可以定下这样的一个定义：假如說話的人可以由一种方言过渡到另一种方言，或者由兩种方言过渡到民族語言，不致有什麼驟然的中断，而只有一些連續的小適应，那末我們所有的就只是同一种語言的兩种方言。如果大家同意这个观點，那末，我想人們就再也不能怀疑漢語的不同方言是屬於一个漢語的，这就是單一的漢民族的語言，这种語言有可能並且有必要促快地統一起來。

可是語言学家能够用怎样的一些方法來帮助这种統一呢？關於这一點，我敢向大家說一說在我們的國家裏所做的，不过在那裏，我要附帶声明，工作比在中國的要容易得多。

我們首先仔細地研究了各种方言事实的实际情况，確定了它們將來發展的可能的方向，大体上能够說出其中哪些是与語言發展的規律相符合的，哪些是不相符合的。然後我們編印了一本關於正字法的手冊，这个手冊不但就理論的观點和实用的观點討論了正字法的事实，並且討論了正音法的事实。我們現在还剛編好了一本關於正音法的手冊。这些手冊的作者在越來越廣泛的範圍內充分討論了區域性的發音問題之後，遇到每一个特殊的事实都注意到哪一个發音可以說是最好的，然後在这發音的基礎上確定了那書寫的形式。这个形式於是在教育事業中和出版事業中成了强制的規範，很快就擴展到全國去。我們其後还編印了一本規範語法，把可以認为正確的形态学形式和造句法格式確定下來，同時指出那些大家認为不大好的应該避免的形式和格式。最後我們还正在編印現代文学語言的詞典，同样是有規範性的，因为它对每一个詞都註明它的修辞的特點，例如方言的、古語的、俗語的、書本上的等等，这样可以使讀者把那些可以視为文学語言的詞和其他应該在某种情况下使用的詞區别開來。

一般人对於这种進行方法的抵抗是相当微弱的。坚決要維護某一地區的說法的人並不很多。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苦心作成各种規範的語言学家全國各地的都有，在他們当中，大家也不需要常常撤回一些有鄉土观念的例子。他們很快就明白为了民族的利益必須与目光短小的劣根性作鬥爭，放棄某些沒有任何机会强加於全國的習慣。有兩三个作家誤以为新的規範將禁止他們不能使用區域性的方言詞曾提出抗議。關於这个問題，下边再作解釋。

我首先要說明，問題不在於依照它的嚴密的形式

採用任何一种方言。那被採用为基礎，並且已經把大批材料供給了民族語言的方言可能有些过分誇張的特點，有些比起其他方言还不如的公式。这样一來，我們有時候就应該撇開这些基礎方言的特點而求助於其他方言的材料。有一个事情我覺得特別有趣的，应該在这裏說一說，那就是当一种方言被採用为文学語言的基礎，並且其他地區的居民開始在書面上和口头上使用它的時候，这种方言，就它原有的而不是文学的形式來說，会比其他方言更快地走上退化的道路，並且更快地被看作是可笑的，比方英國的倫敦东部土音（cockney），法國的巴黎周边的發音，罗馬尼亞的哇拉西土語等都是这样。一本小說的正面人物如果是屬於一个离開主要的文化中心很远的地區的，那末他的說話中可以容許有些區域性的特點，但是假如他使用一些屬於作为文学語言基礎的方言的土語化的形式，那末他就很容易变成可笑的，作家將不能達到他的目的。理由如下：在周边的地區，在某一个期間，不管是知識分子还是農民，每一个人的說話裏都或多或少帶有一些方言的特點，所以使用一些屬於这些地方土語的區域性的形式就不足以把一个人歸屬於缺乏文化的人物。反过來，假如那地方土語被採用为民族的文学語言的基礎，那末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很快達到了脫离那文学語言沒有採用的少數的區域性的特點，使用这些特點就足以标誌那說話的人是一个沒有文化的人物。这使我們回憶起葉斯丕森給文学語言所下的定义（我只就所能記憶的引用）：在一个人的說話中，假如大家就他的發音辨別不出他是从哪一个地區來的，那末他所說的就是文学語言。由此可以証明文学語言和它用來做基礎的方言是不相同的。

我現在要說到作家們对於民族語言的使用問題了。一方面，任何藝術家对於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表達的方式。另一方面，任何藝術家的目的都应該是要創造出一些为全民族所能了解的作品。这就是語言材料裏面兩个可能的極端的界限：不能光是抄襲每一个人都看做模範的陈辞濫調以致庸俗不堪，也不能每一句說話都独出心裁以致除了自己之外誰也不能了解。所以在这裏面也要找出那正確的中庸之道。为了要能够表達自己的人生經驗，为了要能够把那些由現实中抽取出來的人物安排在適当的环境裏，为了要能够創造地方色彩，人們有時候需要複製出一些區域性的特點。为了要能够为全民族所了解，人們就不能用土語寫作，用任何方言寫作，而必須用民族語言寫作。

我所說的这些關於區域性的形式的話，我覺得也同样適用於古代的特點和行業的專門術語。为了描一个十六世紀的農民起义，絕不需要採用誰也不容易了解的十六世紀的語言。为了描寫礦工的生活，沒必要摹拟他們的語言。我們解放後不久，在戲院裏演出了一个戲劇，剧情是在一个工廠裏發生的。那作家採用了一些技術上的專門名辞，这对於工人是熟的，可是对於廣大的觀众却是一無所知的，結果大就很不容易了解那剧情。

为了要創造地方色彩，通常有很少的一些特異的特點也就够了。我們的最偉大的傳記作家米海尔·沙德窩奴，他出版了許多歷史小說，只用現代的文学語寫作，已經常常能够在使人回憶起古代这方面做得成功。当然，他有時候也採用了一些古代的詞語，那是在一些大家还能够認識的古語中經过一番很仔的挑选的，或者只从上下文就可以了解它們的意义的可是使他的故事帶上所需要的古代色彩的，主要並不是这个；那毋寧說是因为在裏面我們找不到任何罗尼亞語新近的外來借詞，这些新的外來借詞他都完規避了，而只用了那語言的一些其他各种材料。对區域性的色彩也是一样。罗馬尼亞的偉大作家克蘭並沒有像那些比較次等的作家所做的那样，把他的鄉土語的一个照像給我們：這些土語沒有一本詞典帮助就讀不下去，而这些与其說是作家的工作不如是方言学家的工作。一个优良的作家是知道怎样去擇他感覺兴趣的土語的主要特點的，这已經足够使創造地方色彩。他採用了这些形式不只是要容易为者所了解，有時候並且可以把它們介紹到通用的文語言裏面去，从而丰富了文学語言。

罕用的表現法，不管是不是區域性的，运用得当，可以吸引讀者的注意力，產生很大的效果。反來，假如濫用了它，就不会產生藝術的效果，而只使人討厭。關於詞彙，特別提出來，我还要多說些：偉大的詩人通常甚至連那些不大通用的文学語的詞也要規避不用，他們要把那些最常用的詞加以妙的安排，从而求取最好的效果，正如拉丁詩人何斯所曾經推荐过的；当然，我們不应該光从形式方去判斷一篇文学作品的好坏，假如它的內容是毫無值的，那末無論把它安排得怎样好，也不能使它成有價值的作品。可是在这裏，我們只能討論關於語的問題，關於內容的問題我們假定那是已經解決了的

一篇作品缺乏價值，有時大家把它解釋为是由詞彙貧乏，並且以为一个作家的詞彙越是丰富多采那末他的作品就越有價值。結果，我們讀到一些文

（轉 18 頁

全國文字改革会議决議

全國文字改革会議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在首都举行，参加的有來自全國28个省市、自治區和中央一級各机關、部隊和人民团体的代表207人。会議听取和討論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吳玉章主任所作《文字必須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報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張奚若部長所作《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为标準音的普通話》的報告，一致表示同意。

会議討論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所提出的《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異体字整理表草案》，並听取和討論了葉恭綽常务委員《關於漢字簡化工作的報告》。会議对於《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作了必要的修正補充以後，对於上述文件一致表示同意。

会議經过熱烈的討論以後，認識到漢字必須改革，漢字的根本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目前，逐步簡化漢字並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为标準音的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是適合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的；特別是推廣普通話，將为漢字的根本改革準备重要的条件。

会議決議：

1、建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把修正後的《漢字簡化方案》提請國务院審定公布实行。

2、要求各報刊和文化教育机關廣泛宣傳簡化漢字；各級学校使用簡化漢字；出版和印刷机關立即着手改鑄銅模，迅速採用簡化漢字，並按照異体字整理表在出版物上廢除異体字。

3、要求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繼續簡化漢字、整理異体字的工作，並繼續向羣众廣泛徵求意見，早日完成漢字的簡化和整理工作。

4、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首先对全國各地小学、中学、各級師範学校分別作出指示，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为标準音的普通話；並且指示各地教育行政部門有計劃地分批調訓各級学校語文教師学習普通話。關於部隊推行普通話办法，建議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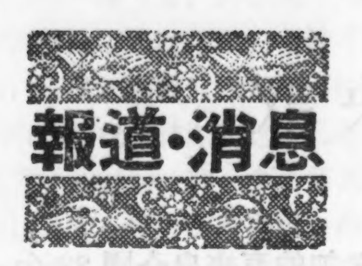
5、建議在全國各省市設立推廣普通話的工作委員会，組織社会力量，特別是廣播电台和文化館站，大力提倡学習和使用普通話。

6、建議中國科学院和各有關高等学校合作，進行全國方言調查，編寫普通話的教材和参考書，以便利各方言區人民学習普通話。

7、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和有關部門進一步推廣報紙、雜誌、圖書的横排。建議國家机關、部隊、学校、人民团体推廣公文函件的横排、横寫。

8、建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早日拟定漢語拼音文字方案草案，提交全國各界人士討論並試用。

1955年10月23日



全國文字改革会議概况

1955年10月15日上午9時，全國文字改革会議在首都隆重地举行了開幕式。

会議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联合召開的。这次会議的任务是在漢字改革的正確方針之下，首先解决兩个迫切的問題：通过漢字簡化方案和推廣以北京語音为标準音的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参加会議的有來自全國28个省、市、自治區和中央一級各机關、部隊、人民团体的代表207人。

会議推选了：王力、王芸生、朱学範、江牧岳、老舍、刘風竹、何公敢、沈兹九、吳玉章、邵力子、林漢達、罗常培、陈望道、陈鶴琴、金湘、胡愈之、胡乔木、韋慤、袁麗華、張奚若、董純才、傅彬然、葉聖陶、葉恭綽、魏傳統、鄭材、黎錦熙、薩空了等28位代表組成大会主席团；葉籟士、刘子餘、莊棟、鄭之东分任正副秘書長。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主任吳玉章致開幕詞。他說：中國共產党、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都十分關怀和重視文字改革工作。从1952年起，在前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員会之下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会，到1954年12月改組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作为國务院直屬机構。今年1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和教育部共同發布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在全國各地展開討論，徵集意見。此外，教育部在制定常用字和統一語音方面也曾經進行了不少工作，但还只是一个良好的開端。他要求專門家、学者、文教工作者和熱心文字改革的人士緊密团結，積極工作，穩步前進，完成文字改革的艰巨任务。

國务院副總理陈毅就目前政治形势和文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問題作了重要報告，並傳達了中央負責同志对会議的關怀和支持。

中國科学院院長郭沫若以《为中國文字的根本改革鋪平道路》为題在会議上講話。他特别就漢字的發展歷史和改革道路，作了科学的分析。

在開幕式上講話的还有文化部部長沈雁冰。他代表文化部和全國文学藝術工作者对文字改革表示衷心的拥護，並号召全國文藝工作者、出版工作者、教工作者密切联系，積極工作，为实現文字改革、漢規範化而努力。

下午接着举行全体会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任吳玉章作了《文字必須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告。他概括地說明漢字的歷史貢獻和今後相当長的期內的作用，漢字为什麼要改革，漢字簡化工作为麼必須采取"約定俗成，穩步前進"的方針。他特别出，漢字簡化並不能根本解决文字改革問題，我們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共同的拼音方向"。为着实現漢字拼音化，必須做系列的準备工作；而在目前，推廣普通話，不但有於社会主义建設，同時也給中國文字的根本改革創了有利的条件。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常务委員葉恭綽在全体会上作了《關於漢字簡化工作的報告》。他对漢字簡化歷史和近年來漢字簡化工作的經过，漢字簡化工作方針、步驟、方法，以及羣众对漢字簡化方法上的見，都作了比較詳尽的說明。

10月16日(星期日)休息。代表們利用休息時間参观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举办的中國文字改革文資料展覽。代表們一致認为，这个展覽对於關心中文字改革事業的人都有極大的帮助，紛紛建議在全各主要城市巡迴展出，編印文献性的專集等等，以大文字改革工作的宣傳。

17日整日進行分組会議。全体代表分組討論吳章主任和葉恭綽常务委員的報告。代表們对於報告提出的方針、步驟、方法，一致表示拥護，並且熱地提出許多補充意見。

18日整日和19日上午，仍然進行分組会議，論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提出的《漢字簡化方案(修正案)》和《第一批異体字整理表》。代表們对包括《簡化表(512字)》和《簡化偏旁類推表》兩部分的《漢字簡方案(修正草案)》，逐字討論，提出不少宝貴的修改補充意見；並对在方案中未肯定的9个字進行了票。对於《第一批異体字整理表(草案)》，作了一般

則性的討論後，由代表們在表上塡註意見，交由主席團整理。

为了有效地及時地整理代表們提出的關於簡化字和異体字的意見，迅速作出決定，主席团决定：由各組分別选出代表各1人，並聘請魏建功、曹伯韓、傅彬然三位代表，組成專門工作組，立即進行有關簡化字和異体字意見的整理工作，限期於22日前向主席团提出書面報告。

19日下午，举行全体会議，由教育部部長張奚若作題为《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为标準音的普通話》的報告。他就漢語規範化对我國社会主义建設的重要意义，为什麼选定以北京語音为标準音的普通話，以及推廣普通話的方針、步驟和措施作了具体的說明，最後指出推廣普通話的教学，擴大它的傳播，是一个嚴肅的政治任务，希望語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聞出版工作者和其他文化工作者積極地行動起來，勝利地完成这一政治任务。

接着，中國科学院苏联顧問謝尔久琴柯教授作了專題学術報告——《關於中國文字的幾个問題》。他客觀地对漢字的歷史地位作了眞实的評價；同時駁斥了西歐資產階級学者們關於漢字起源說的錯誤观點，科学地分析了漢語和漢字的特點，漢字在中國为什麼被使用得那麼長久的原因，以及方言分歧現象的社会根源。他着重地指出："超方言"文字的可能和無害的存在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現在唯一正確的是走拼音化的道路；有人歪曲斯大林的著作，在"語言革命"和"文字革命"中間画上等号，把文字改革同語言發展階段論的荒謬理論同等看待是沒有任何根据的，斯大林在他的關於語言学的天才著作中講的是語言，从來沒有把語言和文字看成一个东西。關於漢語拼音方案，謝尔久琴柯教授推荐了只包括 28—29 个字母的國际化的音素制方案。

20日整日和21日上午代表們分組着重討論張奚若部長的報告。代表們一致贊同政府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措施，積極地从各个專業的角度提出許多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建議。在多數小組上，代表們还交換了对漢語拼音方案的初步意見。

21日下午和22日整日举行全体会議，听取部分代表發言。21日下午在大会上發言的代表有：南京師範学院院長陈鶴琴、南京大学教授陈中凡、天津市第六區第二工人業餘学校代理教導主任陈淑華、北京市第二实驗小学教導主任鄭芸、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語文編輯室主任蔣仲仁、安徽省教育廳副廳長操震球、中國作家协会副主席老舍、中央民族学院第四教研組（苗瑤語）教員吳滌平、湖南省湘陰縣小学教師任培定、河南省開封一中副教導主任張中傑、旅大師範附屬小学教導主任王茂業等11人。22日上午在大会上發言的代表有：復旦大学校長陈望道、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魏傳統、大公報社長王芸生、山西省教育廳秘書張一之、北京師範大学附屬小学校長李紀生、江苏省無錫縣蠡國區扫盲中心学校校長何养初、中華人民共和國邮电部部長朱学範、雲南省昆明一中教員彭允中、北京大学漢語教研組主任王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盲聾啞教育处处長黃乃、中國科学院西北分院副秘書長袁翰青等11人。22日下午在大会上發言的代表，除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推行普通話指導处处長徐世荣、吉林省教育廳廳長刘風竹、廣播事業局總編室主任丁一嵐、光明日報總編輯主任高天、湖北省文史館文字改革研究小組組長耿長寅等5人外，还有：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委員葉籟士代表該会所屬拼音方案委員会就拟訂拼音文字方案工作進行的情况，作了簡明扼要的發言。山西、河北、湖北三省教育行政部門派來的幹部薛長寿、孫培均、罗若梅，分別報告了当地举办普通話訓練班的工作經驗。發言的代表从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職業部門充分反映了羣众对文字改革、推廣普通話的迫切要求，141个試用簡化字备受羣众欢迎的情况。熱烈地提出了对实現文字改革和漢語規範化的具体建議。

23日上午，代表們分組討論了主席团根据各代表所提簡化漢字修改意見整理成的修正稿，以及大会決議草案。

23日下午，会議举行閉幕式。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主任吳玉章發言。他總結过去从事文字改革工作的經驗，歸納成四句話：全面規画，加强領導，努力宣傳，動員羣众；並作了懇切的說明，号召語文工作者共同努力。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委員胡乔木，受会議主席团的委託作總結性的發言。他对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和根本改革漢字的準备工作等三个問題，以及会議討論中提出的問題，作了詳尽的說明。他指出，文字改革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这次会議僅僅是開端。漢字簡化是一个適应廣大羣众需要的迫切任务，在今後仍須積極繼續進行。推廣以北京語音为标準音的普通話同样是適应廣大羣众需要的迫切任务，这是加强漢民族政治、經济、文化的統一的必要步驟，也是進一步發展漢語和準备漢字根本改革的必要步驟。推廣普通話是有困难的，但是只要全國各方面大力提倡，並且

（轉 42 頁）

現代汉語規範問題学術会議紀要

緊接着全國文字改革会議之後，中國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北京召開了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学術会議。这次会議的主要目的在於：(1)明確現代漢語規範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2)对漢語規範化的一些原則性問題進行討論，(3)組織全國語文工作者共同進行漢語規範化的工作。

会議从10月25日開始，到31日結束。参加会議的有北京和其他各地的語文研究工作者、語文教育工作者以及文学，翻譯，戲劇，电影，曲藝，新聞，廣播，速記等方面的代表共126人。参加会議的还有党和政府的負責人員。中國科学院並邀請了苏联的漢語專家鄂山蔭教授和郭路特教授，波蘭漢語專家夏伯龍教授和赫曼來夫斯基教授。正在中國訪問的罗馬尼亞語言学家格拉烏尔院士以及國务院苏联文教總顧問馬里采夫，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苏联顧問謝尔久琴柯教授，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國語言学家柳烈教授，也都应邀参加了会議。

会議由中國科学院院長郭沫若致開幕詞。郭沫若說：我們所提出的現代漢語規範化問題，就是要促使漢民族共同語的組成成分尽可能合乎一定的标準；就是要根据語言發展的規律，採取必要的步驟，使它在語音、語法、詞彙上減少紛歧和混乱，增强統一性。民族語言的統一是民族發展过程中的必然趨势，过去是听其自然的，現在我們是有意識地促進民族語言的發展。今天我們國家正集中力量進行大規模的生產建設，全國人民在各个工作崗位上進入了越來越廣泛的集体生活和共同劳動，这就更加迫切需要一个規範明確的民族共同語，同時由於文化教育的發展，現代漢語規範化的重要性就更顯得突出。漢語規範化問題中，語音的統一特別重要，因为漢語方音的紛歧最大，另一方面語音的統一也以文字改革为必經階段。这次全國文字改革会議已經作出決定，推廣以北方話为基礎、以北京語音为标準音的普通話。我們应該擁護这个決議。在这次会議之後，我們必須廣泛宣傳現代漢語規範化的重要性並且組織全國語文工作者在促進現代漢語規範化方面進行有計劃的分工合作。

國务院副總理陈毅到会作了重要的指示。他指出：漢字改革、現代漢語規範化和在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实行拼音文字这三方面，是当前語言学工作中的主要任务，專家們要經过反覆討論去制定实施方案。在这次会議上，專家們通过学術上的討論，对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取得一致的意見，有了專家的一致，才有工作方案的一致，这样才便於全國各地去推行。他勉勵語言学工作者要消除成見和宗派主义思想，尊重不同的意見，互相商討学習，以加强相互間的团結。他指出：專家要把自己的經驗知識傳授給下一代，要用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培养新生力量方面。

接着，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副所長呂叔湘在会議上宣讀了罗常培所長和他合寫的“現代漢語規範問題”的報告。这个報告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討論为什麼在这个時候提出現代漢語規範化問題。報告指出，現代漢語在語音、詞彙、語法各方面的紛歧情況已經不足以滿足我們發展文化和進行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廣大人民迫切要求学習統一的、有規範的民族共同語，使民族共同語進一步規範化並且廣泛推行的時机已經成熟了。

第二部分討論漢語規範化的一些原則問題。

(1)關於民族共同語的形成問題，民族共同語和方言的關係問題：報告指出，民族共同語的形成並不以消滅方言为条件，它是在某一方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基礎方言的地區總是在这个民族的文化上和政治上佔重要位置的地區，基礎方言本身也常常最能代表整个語言的發展趨势。民族共同語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不断地从其他方言裏吸取营养，而方言在民族共同語的長時期的影响之下將逐漸萎縮而終於消滅。从歷史發展來看，白話文学作品从«話本»、«元曲»到«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它們的方言基礎是北方話；共同口語的開始形成，也不会晚於14世紀。漢民族共同語的長時期形成过程，到本世紀初年開始加速。我們現在的問題不是在平地上造樓台，而是肯定既成的事实，在已有的基礎上提高——就是肯定以北方話作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为标準的普通話是民族共同語，在这个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的規範化。

(2)書面語言和口語關係問題：文学言語的主要形式是書面形式，它不是日常口語的複製品，而是

常口語經过文学加工的形式。現代的文学語言必須跟現代口語基本上一致，適当地吸收古語和外來語中有用的成分。

(3)規範化和个人風格的問題：語言規範化和文体多样化並不矛盾。有一定規範、一定标準的文学語言是可以讓一个人發展他的个性的。作家們应該避免濫用方言。

(4)規範化和語言發展的問題：一个詞的音改变了，一个詞的意义擴大或縮小了，一种新的語法格式排擠舊的語法格式，这類問題時常引起新舊之間的爭論。我們应該根据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來权衡取捨，不能一味崇尙傳統，也不能無选擇地欢迎一切新的。

(5)語言規範化和語言学家的責任：19 世紀後期歐美資產階級語言学家对於語言採取自然主义的态度，不注意語言規範的問題。这种理論的根本錯誤在於撇開語言使用者來看語言，在於不联系社会發展來看語言。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家認为語言学家应該研究語言的規範，並且通过这种研究促進語言的規範。解放前，中國語言学界受了資產階級唯心主义特別是胡適之流的实用主义思想的侵蝕，很少人研究漢語規範的問題。現在我們对於这个問題既不要抱自然主义的态度，也不要草率从事，犯主观主义的錯誤。要深入調查研究，在語言發展中找出信而有徵的規律來。

第三个問題是怎样進行規範化的工作問題。

首先是思想工作。要提倡在公共場合說普通話，要促使每一个寫文章的人注意語言的純潔和健康。尤其重要的是使作家，翻譯工作者，电台廣播員、电影和話劇演員等使用語言有示範作用的同志們中間，取得認識上和行動上的一致。其次，教育部文化部等机關要採取一些行政措施，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語言規範化的工作。語言学工作者要加强語言学理論的学習，学会把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原理和方法应用到漢語研究方面。

在具体工作方面，報告中提到以下幾个項目：(1)詞典：詞典是進行規範化的最重要的工具。我們需要有現代漢語詞典、漢語大詞典、正音詞典，虛詞詞典，同义詞典、各種專科詞典、外國語和漢語对照詞典以及标準通用詞表等。(2)語法研究：在研究語法体系的同時，要多做基層的研究。(3)方言調查：訂立計劃，重點調查，訓練幹部，逐漸擴大調查範圍。調查方言不僅要注意語音，也要兼顧詞彙和語法。方言調查要配合推廣普通話的工作，也要同漢語史的研究相結合。(4)教材和教学法的研究：例如正音教学，詞彙教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是对推行普通話直接有關係的重要工作。

此外，还有許多研究工作要做。全國語言工作者应該加强联系，分工合作，一方面大力培养新生力量，一方面善於使用現有力量。还要廣泛宣傳，使語言規範化变成一个社会运動，羣策羣力地來進行，才能早日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 * *

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的苏联顧問謝尔久季柯教授，也提出了書面報告，報告的題目是《漢語标準語規範化的重要性和一些原則性的問題》。

報告中首先說明了漢語規範化的重要性。

謝尔久季柯認为漢民族正在完成以北方方言为基礎的民族共同語。不过这种共同語現在还沒有能普及到全國各地，学校裏目前还沒有一种嚴格規定的語音規範來教学生，而容許用任何方言和小方言教学。廣播工作者和地方戲劇工作者往往还得依賴地方居民的方言。在全國的或全省的会議上，听众常常听不懂那些用差別很大的方言所作的報告。这些情况，都說明漢語还需要有明確的規範。

从漢字改革方面看，漢語規範化也是非常必要的。改革漢字，必須走拼音文字的道路，而拼音文字只有在統一的民族共同語的公認的規範在全國範圍內得到鞏固和推行的条件下，才能实現，因为拼音文字的創造是要以確定标準語音为先决条件的。

關於漢民族共同語的規範原則，謝尔久季柯教授認为：民族語言一般都是在一种地方方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这个地方方言是最充分最明顯地体現着該語言發展的一般趨势，体現着全民語的特點的。人們確定方言的時候，应該依据一种地域上分佈得足够廣闊的、在人民中間有足够的威信的、体現着語言發展一般趨势的方言，並且通常又是首都的或是很大的政治文化中心的方言，而確定标準音的時候，应該根据某一个分佈範圍不太廣的有威信的小方言。根据这个理論，謝尔久季柯教授認为漢民族共同語应該以北方方言为基礎，以北京音为标準音。

關於文学作品語言和語言規範化的關係，謝尔久季柯教授認为：文学作品語言是民族共同語大的使用領域之一。在文学作品語言裏，尤其是对話裏，容許借用能作語言的藝術表現手段的方言、俚語的个別詞語。

語言規範並不是停滯不動的。尽管語言的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具有穩固性，然而还是經常發生一些变化。这种情况有時是由於有些方言成分滲入共同語而產生的；有時是由於語言巨匠們估計到語言發展的一般趨势和社会上对於丰富詞彙或語法修辞的要求而創

造的。不过这种脱离語言規範的現象，必須有促進語言丰富和發展的作用，才具有生存的权利而被社会所承認。因此，虽然文学作品的語言的範圍比較寬，但是作家無論如何不能用不必要的希奇的詞(地方土語、諺語等)來堵塞民族共同語，降低文学作品的質量。

对兩个報告的討論和發言

会議就罗常培所長、吕叔湘副所長的《現代漢語規範化問題》和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顧問謝尔久夅柯教授的《漢語标準語規範化的重要性和一些原則性的問題》兩个報告裏提出的問題進行了討論，並有25位代表和7位外賓先後在大会上發言。大家对漢語規範化的可能性跟必要性取得一致的認識。周祖謨代表說：这次会議的召開是及時的，漢語規範化首先要使語文工作者思想認識取得一致。關於規範化的重要性，他認为可从四方面來看：(1)共同語言是民族特徵之一，漢語自古以來就是漢族的共同語言，漢語有其發展的規律，不过因为方言很多，很多方面表現分歧。我們要在統一的書面語言的基礎上確定口头語言的共同規範。(2)語言不僅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發展文化的利器，現在祖國在建設社会主义，語言在提高文化普及教育上都有重大作用。为了配合國家的社会主义經济，文化的建設，語言必須有一致的規範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3)規範化是为实行拼音文字作準备，必須使普通話在語音、語法、詞彙各方面有一定的規範，否則拼音文字的推行就会遭到很大的困难。(4)語言規範化可促進民族共同語的發展，使它更趨於完善和精密。

廣播、話剧、电影的工作者的代表們分別从自己的崗位工作上說明規範化的必要。丁一嵐說：方言的分歧使廣播工作發生很大障碍。例如溫州听懂北京話的人只有5%，为了照顧大多數听众不得不同時用溫州話廣播，但溫州話的廣播範圍也只限於一百里之內，这就大大地限制了廣播的作用。其次由於語音上沒有明確的規範，廣播工作者常常感到一些困难，例如“暴露”的讀音就曾在听众中間引起爭論，使我們無所適从。同音詞也往往引起誤会，例如：有一次廣播說：“產品全部合乎規格”，有的听众誤会为“產品全不合乎規格”。刁光覃和葉子兩位代表都指出話剧工作者也同样感覺到漢語規範化的必要。話剧現在只能在大城市演出，不能進入農村，在有些方言區城市演出也受限制，像《龍鬚溝》这样好的話剧，在某地原準备演20場，結果只演8場。現在剧院招考演員往往因他的語音關係不能錄取，这就使培养新生力量擴大文藝隊伍受了影响。演員的語音不純，有時会在舞台上形成一家人的語音不一样的現象，使听众听起來很不順耳。孫謙和吳青代表在發言中指出电影工作中也感到規範化的必要：影片《春風吹到諾敏河》採用东北話，許多地方的观众听不懂，效果很不好。《陝北民歌》最初用陝北話，因为許多观众听不懂，又改用了“北京話”，浪費了人力、物力。

漢語規範化对教学工作者更感到迫切。常常因为語音上的隔閡，很好的內容不能使学生全部了解，教学速度和教学效果都受到很大影响。有時甚至造成誤会。馬学頁代表說：有一次他对一个班長交代某一課要“講”兩小時，这位班長把“講”字听成“減”字，“講兩小時課”變成“減兩小時課”。少數民族学習漢語也感到漢語規範化迫切需要。解放以後，少數民族生活在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同漢族的接觸頻繁了，他們都自願地想学好漢語，以便於学習漢族的文化，从漢族取得各項帮助，但是在学習漢語時遭遇漢字的困难，又遭遇方言分歧的障碍。有一位海南島的黎族同志，在海南島学習廣东話，調到武漢工作，廣东話就失去了作用，不得不学習武漢話；現在來北京学習，又要学習北京話，單在学習方言上就費去了他很多的時間。吳昌代表指出：延边朝鮮族人民从小学一直到大学二年級的十幾年的学習过程中，漢語始終是一門很重要的課程，但是效果不高，原因之一就是由於漢語本身規範化的程度不够。鄧懿代表指出，在教外國留学生学習漢語的時候，由於漢語語音、詞彙、語法都沒有足够明確的規範，因此，在讀音、詞的用法、詞的解釋、虛詞的使用範圍、句子的構造各方面，教和学双方都感到很大困难。

速記工作者对漢語規範化也感到特別需要。刘據代表指出，速記是利用拼音的，由於語音沒有規範，速記方案就人各一套。根据北方話製訂的速記方案，作報告的人如果不用北方話，就很难記或簡直不能記。他感到这个問題迫切需要解決。

語音方面的討論

關於普通話以北方話为基礎方言，以北京音为標準音的規定，岑麒祥代表說，以北京音为普通話語音的标準是歷史發展的結果，北京音內部有些分歧，應当以知識分子的語音为标準（英語，法語都是这样）。詞彙則不同，詞彙应以北方話为基礎，別的方言中有用的詞語都可以吸收，北京話的土話則可以不要。鄭之东代表說：要規定拼音文字方案，首先要確定語音。过去有人認为拼音文字的語音系統可以不一

是不对的。不应認为普通話是个大雜拌，应以北音为标準。不过有一个前提，就是不採用北京土

陸志韋代表的發言从討論普通話的語音基礎出，把北京話的語音和其他官話方言的語音作了一番。關於尖团音，他指出，据最近調查的1279點，和北京一样不分“尖团”的有1020點，佔79.9%；“尖团”的259點，佔20.3%。全國有二十万以上人的市共有34处（据1951年的統計），只有石家、青島、南京三处分“尖团”。關於ㄋ-和ㄌ-的分，調查的186种官話方言之中，有149处是同北京样，分别这兩个声母的。關於-ㄣ和-ㄥ，-ㄧㄣ和ㄥ的分别，186种官話方言之中有106种跟北京話样。陸志韋代表所指出的以上幾點，都充分說明了京語音最能体現官話區語音的共同性，最具有作标音的資格。

丁声樹代表在介紹方言區情况時，指出了官話區言在各方言中的既成优势，他說，“官話”區包括長江北地區，長江以南鎮江以上九江以下沿江地帶，北（东南角除外）、四川、雲南、貴州四省，湖南西北角，人口約三億八千七百万，佔漢族人口總數分之七十。本區的語言一致的程度很高，从东北的濱到西南的昆明，直線距离有三千二百公里，从南的南京到西北的酒泉，直線距离有兩千公里，各的人通話沒有大困难。这麼多人口，这麼大的地語言如此一致，这在世界上可說是絕無僅有的。的方言是很複雜，因此常常有人片面强調複雜的面，忽略了一致的一面，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北京是本區最主要的方言，本區的人即使沒有学过北京也能听懂北京話，其他方言區能听懂北京話的人也多，大家也都願意学習北京話。海外華侨原籍在本的不多，可是華侨的学校大半都教北京話。

对北京語音細節上的規範問題，陸志韋代表就兒和輕音兩點發表了意見。他說，顯而易見，北京話裏的兒化並不發生一律平等的作用。有些兒化詞有區別意义的作用的，有些是沒有这种作用的。陸韋代表認为北京話的輕重音也有起區別意义或區別的作用的，有不起这种作用的，我們可以根据不的情况，採取不同的处理。

夏青代表說，廣播時兒化詞如“零件兒”，“隔壁其他地方的人听不懂，外地人学北京話往往把不的詞說成兒化，如“秋天”說成“秋天兒”。在莊嚴体裏用兒化詞也覺得不妥当，但“沙仁兒”說成仁”又不習慣，这問題很困难，希望語言学專家加研究，找出規律。

彭鐸等代表說，輕重音是北京音系的特色之一，有區别詞义，構詞等作用，能够丰富語言，应該全部保留。

關於北京話裏一些讀音分歧現象的問題，孫崇义代表說，一詞多讀可以这样來解决：如果韻書上的音現在已經死了，像“暴”（暴露）的ㄆㄨˋ一音应該捨棄，而从現在的音，讀ㄅㄠˋ。但是“突擊”，“可惜”，“投擲”，“建築”，“性質”，“驅逐”等原是陽平字，現在都有陰平的讀法，“波”有ㄅㄛ、ㄆㄛ兩讀，这類情况，何去何从，就很难確定。刘鏡人代表說，關於語音方面的規範，現在政府已經確定拿北京音作标準，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完全拥護。但北京音本身还存在問題，如語音和讀音之別。如“誰”有ㄕㄟˊ、ㄕㄨㄟˊ兩音，“血”有ㄒㄧㄝˇ、ㄒㄩㄝˋ兩音等；一詞又讀，如“波”讀ㄅㄛ，又讀ㄆㄛ，“摸”讀ㄇㄛ又讀ㄇㄠ等；«國音常用字彙»和«新華字典»兩音都标注，而漢語課本“血”只要求讀ㄒㄩㄝˋ，“摸”只要求讀ㄇㄛ，这种分歧，使教学發生困难。这些問題的处理，我的意見是：(1)要看这个字在複合詞裏的關係，如“头尾”、“排尾”等中的“尾”应当讀ㄨㄟˇ，“尾巴”裏的“尾”可以讀ㄧˇ。(2)要看这个字在複合詞裏和其他字發音上的關係，如“血液”、“血压”中的“血”讀ㄒㄩㄝˋ，在發音上比較方便，讀ㄒㄧㄝˇ不方便。(3)除这以外，应以口語作标準統一起來，如“誰”讀ㄕㄟˊ不讀ㄕㄨㄟˊ。

詞彙方面的討論

詞彙方面的規範問題，在鄭奠代表等的書面發言中，举出了一些規範化的原則：(1)關於吸收方言詞的問題，他們認为普通話一方面捨棄基礎方言中过於土的某些詞，一方面从其他方言中不斷吸取所需要的詞，所以在詞彙規範問題上普通話对它的基礎方言的關係主要在於怎样去掉某些詞，对於旁的方言的關係主要在於吸收某些詞，有些詞只在北方話的某些个別地區应用，像东北的“不觧”（不行，不能算完）；山西、陝西一帶的“地板”（地）“婆姨”（老婆）等，可以不当作普通話詞彙看待。有些詞原來不是北方方言中的，但因为它有特殊的意义，在北方方言中沒有習用的同义詞，像“垃圾”、“拆爛污”、“扯皮”“名堂”等，为了丰富普通話的詞彙，应当經常把这類性質的方言詞提升到普通話裏來。(2)關於吸收文言詞的問題。有些文言詞和普通話的詞意义相近但並不完全相同，像与“思想”意义相近的“思考”、“思維”，与“光明”相近的“光輝”，与“呼号”相近的“呼籲”；与“消滅”相近的“歼滅”；这些文言性較重的詞，为了表現意义色彩的差別，適应各个語言环境的需要，应当吸收。又有

些詞，來源出於文言、口語中有同义詞，但是由於各地口語的說法紛歧，这些多少帶點文言色彩的詞反而有極大的普遍性，就很自然的被吸收为普通話的詞，例如："父親"、"妻子"、"头"等等。(3)關於外來語的問題，要是普通話基礎方言跟其他方言有並行的外來詞，应当取基礎方言的，例如不用"荷蘭水"用"汽水"。

鄂山蔭教授介紹苏联处理詞彙的經驗。他說：一个方言詞能否進入文学語言要看它的普遍性如何，一个古語的詞彙能否進入文学語言要看它使用的頻率如何。他認为研究現代文学語言裏詞彙單位的普遍性和使用頻率，对任何一种文学語言的規範化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藹璋代表指出詞彙規範化又有三點可以考慮：(1)普通話中的同义詞应該去掉已經逐漸衰亡的，取新生而有生命的詞，如："教室"和"課堂"，取"教室"；"教師"和"教員"，取"教師"。(2)方言詞与北京話的詞同义而文体也相同的，取北京話的詞，如："玉米"和"包穀"，取"玉米"；"知道"和"曉得"，取"知道"。方言詞已在北京話中生根，北京話已普遍採用的，取方言詞，去北京話的原來的詞，如："梳子"和"櫳子"，取"梳子"。(3)關於詞的使用的規範問題应以北京話为标準，如："吃茶"、"喝茶"，取"喝茶"；但方言詞已在北京話中生根，北京話普遍使用的，可以用方言詞，如"泡茶"。

朱德熙代表認为：要是一个詞已經進入書面語，取得了公民权，不妨从寬处理，新生的詞就要从嚴选擇。他更指出，創造新詞有兩个原則，一是要有需要，二是要合乎漢語的構詞規律。

周祖謨代表指出，現在詞彙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用詞的分歧和混乱，例如：同一个东西有很多不同的名称，乱用和生造，詞义的不定。詞彙規範应有一定的原則：(1)要看它的普遍性，(2)要看它出現的次數多少，(3)要看它的精確性如何，(4)要看它是否合乎漢語的發展規律。以上四个原則是互相配合的。

波蘭夏伯龍教授認为同义詞应該慎重处理，同义詞可以供給小說家和詩人藝術上的表現手段。科学和技術的術語应該嚴格統一，民族語言不能容忍術語的混乱。有些由外國語借來而与漢語的精神不調协的技術上的術語，应該代以另外一些術語。吳文祺代表認为同义詞的取捨应該依照精密、完善与丰富的原則，凡是修辞色彩不同的同义詞应予保留。

語法方面的討論

關於語法方面的規範問題，陸宗達代表在他的發言裏有比較全面的討論。他說：以"北方話为基礎
並不能理解成把北方話的語法原封不動地作为規
应当一方面統一北方話內部不一致的地方，另一
也要吸收别的來源的有用的語法結構來丰富民族
語。北方話內部不統一的情形，他举出兩點：(1)
詞的完整性，比如：西南官話區常說"需不需要，反
对，美不美麗……"，在这裏，"需要"、"反对"、"美
都是絕对不能拆開的單詞，拆開了就是破坏了詞
整，是应当排斥的。(2)虛詞跟詞尾的用法：虛詞
漢語語法中所起的作用很大，因此虛詞用法不一
發生嚴重的影响。例如副詞"再"和"又"在北京話
有分别的，可是四川話裏"再"和"又"的用法就有
混乱，可以說"明天你又去吧！"这也是应当排斥
關於普通話吸收别处的語法結構的問題，他認
三點值得研究：一是方言語法的問題，吳語區有
詞"的"表示肯定。这个語气詞是北方話所缺乏的，
然应該吸收。又如吳語"穿穿看"，"作作看"，这个
已形成詞尾，我們採取來可以丰富漢語的形态。
古語法的問題，文言語法是祖國人民幾十世紀來
提鍊出來的，富有準確性和表現力，应該適当地
收。例如數学上常見的"二加三等於五"，"三
一"……，虽然都是文言的語法結構，可是行用已
而且語意簡明，沒有另按現代語法改造的必要。
常見的一种文言格式，像"以退为進"、"以攻为守
"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陣营"，都已經在口語裏普遍
了。採用文言語法应該是採用現成口語所缺少的，
採取同現代語相抵觸的。三是吸收外來語法的問
現代漢語事实上已經吸收了不少外國語法成分，
"關於"、"对於"等的运用，漢語裏本來沒有的，
來却能使祖國語言形式更加丰富，表達能力加强。
是我們在向外國借鏡的同時，一定要注意漢語的
規律。例如，"再一次講課"是按照俄語語法說的，
是漢語裏的"再"跟"又"有細密的區别，漢語的動
又应該放在動詞後头，那就还不如用漢語"再講一
課"和"又講一次課"去分别表達了。我們一定要
那些不中不西非驢非馬的語法結構。不中不西的
結構，主要是受了坏的譯品的影响，是半殖民地
中國留給我們的文化上的污點。像"由於胡風反
集团被揭發以後，使我大大地提高了革命的警惕性
种不中不西的語法結構，足以破坏我們祖國語言
潔和健康，我們一定要排斥。

朱德熙代表对語法方面的規範也提出了他的
見。他認为連詞"和、与、同、及"等，过去只能
詞，現在又能連動詞，可以考慮分工。此外他又

語的構詞法过去沒有很好的研究，今後应該開展这面的工作。關兴三代表也認为方言和共同語意义相而表達形式不同的語法格式，方言应服从共同語，"我搬他不動"的方言格式应服从"我搬不動他"的共語格式。

普通話和方言的關係

關於普通話和方言的關係問題，林燾代表認为，言和普通話之間存在着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矛推廣普通話自然要縮小方言的使用範圍，但是方本身还是要不断發展的，在方言的發展过程中，用不断產生的符合生活需要的新的成分丰富普通話。士代表說：目前漢語的情况是方言太多，不是方太少了，推廣普通話就是尽量擴大普通話的使用範相应地縮小方言的使用範圍。方言在使用範圍上限制，但是並不会因此消滅。文藝工作者代表鄒，过去提倡方言文学乱用方言詞彙是錯誤的。鄂藝教授介紹苏联經驗，从他們的工作实踐中得出这个結論：必須大力扶持基礎方言的規範。这一結在三十年代高尔基的許多有名的言論裏明顯地表示出來。在这些言論裏，高尔基坚決反对使用方言詞同行語等等來堵塞文学語言。在現代的俄罗斯文裏，对話中勉强还可以使用方言詞彙当作一种修辞段，但是也要少用。格拉烏尔院士指出：任何藝術的目的都是要創造为全民族所能了解的作品，因此們就不能用土語寫作或用任何方言寫作，而必須用族語言寫作。吳文祺代表指出：文学語言必須吸收樣的方言詞彙，即特別具有丰富的表現力而普通話沒有適当的詞可以代替的。

關於地方戲問題的意見，周有光代表說，推廣普話不应排斥地方戲，地方戲应該讓它長期存在，因戲有它的藝術特點。馬彥祥代表說：政府提倡發地方戲曲，現在全國的地方戲曲有二百种之多。地戲曲和方言的使用分不開，推行普通話以後，地方曲的腔調和音樂將要变得一致，这是个問題。侯宝代表說：現在地方戲的語言已經自發地接近普通例如山东琴書已經有人用北京音唱；苏州彈詞的白也含有普通話的語音成分。

確定語音規範是目前首要工作

參加大会的代表們一致認为，在漢語規範化工作語言工作者負有特別重大的責任。由於过去中國学基礎較差，現在面臨艰巨的任务，必須發掘潛培养新生力量，充分利用現有的科学研究力量，加强团結；必須有計劃地分工合作，廣泛地進行深入的科学研究，才能把規範化的工作做好。確定普通話的語音規範是目前首要工作，必須迅速進行研究，使普通話的使用和教学有更正確的依据。同時，为了使我們的文学語言更加正確、精密、純潔、健康，現代漢語語法和詞彙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必須大力展開。在即將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普通話的情况下，方言調查有特別重要的意义。語言学理論的研究和漢語史的研究对於規範化的工作有指導作用，也应該予以充分的注意。語言教学必須放在科学的基礎上，也需要進行研究。

代表們都根据上面这些工作要求，結合了自己的業务，踴躍地承担了同漢語規範化有關的研究題目。在語音研究和方言調查方面，担任的人有33位，題目39个；語法研究方面，担任的人有12位，題目12个；修辞研究方面，担任的人有1位，題目1个；文字研究方面，担任的人有3位，題目3个；詞彙研究方面，担任的人有10位，題目7个；翻譯研究方面，担任的有1位；題目1个；在教学研究和教材編纂方面担任的人有6位，題目7个；在漢語史的研究方面，担任的人有4位，題目5个；在文学作品、作家及电影語言的研究方面，担任的人有3位，題目3个。

会議的最後一天通过決議。決議表示參加会議的代表們对於漢語規範化問題有了共同的認識，表示今後应当加强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並提出一些具体建議，包括組織普通話審音委員会，組織詞典計劃委員会，拟訂方言普查計劃，加强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和高等学校語文系科的研究工作上的联系，並共同組織社会力量參加語言研究工作等項。

会議最後由主席团公推陈望道代表作總結發言，指出此次会議的召開是及時的，会議是成功的。陈望道代表並举出会議的重要收穫，也指出会議的缺點，主要是準备工作不够充分，若干專門問題未能深入研討，作出結論。

胡乔木代表的談話

胡乔木代表在大会期間因事未能參加，在大会閉幕後和代表們作了一次談話，对漢語規範化的一些原則問題表明了他的意見。

漢語方言紛歧比其他同等重要的語言的方言紛歧嚴重得多，这对我們民族是非常不利的。因此，漢語規範化工作就顯得特別重要和迫切。

所謂規範化並不是强迫人們按照一种格式說話或寫文章。規範不等於法則。語言的法則是客观存在

的，但是語言学家的任务不僅在於發現法則，並且要依据所發現的法則建立标準，推行这个标準，來影响語言的發展。这就是实現規範化。

从漢語的發展來看，从漢民族的政治經济文化生活來看，普通話已經形成，我們应該去推廣它。除北京語音以外，我們找不到其他地點的語音可以成为公認的标準音。用北京音作标準音是和以北方話为基礎的普通話相联系的。我們不是把北京方言推行到全國，而是按照北京音系的語音來推行以北方話为基礎的普通話。

推行普通話以後，方言是不会馬上消失的。如有人願意說方言，沒有人禁止他。但是方言的活動範圍一定越來越小，为了民族利益，为了民族文化的發展，我們欢迎这种趨势。

有人問：为什麼我們支持少數民族語言的發展，而不提倡發展漢語的方言？我們說：方言跟少數民族語言不是一个問題。語言是民族的特徵，少數民族語言作为一个民族的語言是要發展的；一个民族要求一个語言，方言不能代表民族，因此它不能和民族語言相提並論。

方言在逐漸衰亡过程中仍然为一定地區的人民服务，我們用不着歧視它，但是不要擴大它的影响。地方戲的發展与方言沒有必然的联系。地方戲只要能保持其音樂、藝術等方面的特殊色彩，它还是会存在的。現在擴大方言影响的不是地方戲，而是一部分作家，他們喜欢用大量的方言寫作，这种作法对於民族文化的發展有阻碍的作用。（羣策）

（接35頁）
首先在全國学校、部隊、机關和人民团体中進行有計画有系統的工作，这些困难是完全可以逐步克服的。为着推廣普通話，实現漢語的規範化，並为漢字的根本改革準备条件，需要全國語言科学界和語文教育界通力合作，对漢語進行大規模的方言調查工作，詞彙研究工作和漢字改革方案的实地实驗，同時需要对人民羣众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

接着，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委員王力代表提案審查委員会宣讀提案審查報告。一致通过。

大会秘書長葉籟士宣讀《全國文字改革会議決議（草案）》，一致通过。

最後，由教育部部長張奚若致閉幕詞。他希望全体代表成为文字改革工作的宣傳者和組織者，把大会決議正確地、完滿地予以貫徹和实現。

全國文字改革会議自10月15日開幕以來，經过九天的大会報告、小組討論、大会發言，至此，在經久不息的掌声中，如期勝利閉幕。

* * *

全國文字改革会議閉幕後，教育部接着召集參加这个会議的各地中小学、各級師範学校教師和教育行政幹部代表，举行座談会。

座談会根据全國文字改革会議的決議，研究了推廣普通話的方針和在学校中用普通話教学的步驟、要求，討論了訓練教師、編輯普通話教材等重要問題。

教育部副部長董純才在座談会上作了總結性的發言。他号召在中、小学和各級師範学校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教学，中、小学以及師範学校、工農業餘文化学校和幹部文化補習学校都要積極采用簡化字。教育部將吸取座談会上提出的意見，制定具体指示，報請國务院批准後公布施行。他还說，教育部決定在教育行政部門的公文往來中用簡化字，並且推廣橫寫、橫排；"北京語音教学研究班"正在積極籌备中。

座談会由10月24日開始，26日結束。（陈

中國科学院
学社会科学学
於10月25日到
日召開現代漢
規範問題学術
議。右圖為中
学院院長郭
若致開幕詞。
(本頁照片均係新
記者孟慶彪攝)





❶ 全國文字改革会議第六組小組会討論情況



全國文字改革会議招待代表茶話会（起立者陈望道）



❸ 出席全國文字改革会議的代表参观中國文字改革文献資料展覽館

北京市期刊登記証出期字第022号
經中國人民邮政登記認为定期出版物

每册定價人民幣0.20元
(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月刊
1955年11月号
第41期
1955年11月22日出版

社長 韋愨

編輯委員 丁西林 王力 呂叔湘 杜松寿 吳曉鈴 罗常培 林漢達 陈剛 高名凱 倪海曙 韋愨 陸志韋 曹伯韓 莊棟 傅懋勣 葉恭綽 葉聖陶 葉籟士 鄭之东 黎錦熙 魏建功

總編輯 林漢達

編輯者 中國語文雜誌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總發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國各地邮电局、所
代訂代銷处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預定：三个月0.60元，半年1.20元，全年2.40元；寄費：1.平邮寄費不計，2.掛号邮費由訂戶負担。 1—27,040